

馬克斯  
列寧

藝

術

論

中外藝術研究社校印

1 9 3 2

# 武裝暴動目次

，第二國際與暴動·····	一——九
二，暴動的條件，時間的選擇·····	一〇——四八
一，涅維爾的暴動·····	
二，德國的三月暴動·····	
三，漢堡的暴動·····	
四，上海的暴動·····	
五，廣州的暴動·····	
三，組織暴動之正確的例·····	四九——五八
四，暴動之組織技術的前提·····	五九——五乎
一，在資產階級之武裝力量中間的作工·····	

A22  
4169.1  
4



3 2285 0911 7

二，無產階級武裝力量是組織

三，黨在農民中的軍事工作

五，在工業城市武裝暴動的組織與技術……………八八——一三三

一，武裝暴動過程中共產黨軍事組織的任務

二，城市中常備軍與暴動者軍事行動的特點

三，暴動者的力量與行動的特點

四，武裝暴動的計劃

五，武裝暴動中攻擊的對象

六，暴動開始時的注意點

六，在農業國家中暴動的特點……………一三四——一三八

一，武裝農民的進攻之作用

二，武裝暴動時最民隊伍的行動

附錄

- 一，馬克思主義與暴動……………列甯：一三九—一五〇
- 二，局外人的建議……………列甯：一五一—一五四
- 三，致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及彼得格勒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書……………列甯：一五五—一五八
- 四，告同志書……………列甯：一五九—一六二
- 五，暴動與規律……………馬克思：一六三—一六四

# 武裝暴動

## 一 第二國際與暴動

武裝暴動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形式之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某種人民的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級時，則這種鬥爭形式的採用是絕對必要與不可避免的，這是從整個的馬克思學說（關於社會形式的發展，暴力在歷史過程中的革命作用，國家的作用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無產專政……等等的理論）中直接得出來的結論。否認無產階級武裝暴動（即無產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武裝鬥爭）的必要，便不啻完全否認階級鬥爭，便不啻完全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與革命。同時，即是根本曲解馬克思主義而把牠腐化成爲可厭的宗教條文。

列寧根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說，在其著作中——特別是在『國家與革命』一

書中——藉其偉大的天才，證明這些被機會主義者所拋却和曲解的革命的馬克思的基本觀念的絕對正確性；此外，第二國際的歷史和其崩壞（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與其崩壞，以及牠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這些根本問題——國家，專政，暴動——的關係。），更從事實上異常明顯的證明了列寧的觀念之異常堅定。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武裝奪取政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和在其廢址上建立起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以及對於其他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問題，曾加以機關主義的曲解的，誰都知道，這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的。當馬克

思正以為「暴力在歷史上通常是新制度由孕育牠的舊制度中誕生時之產婆」，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第一個過渡到第二個的革命改造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的東西，而只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註一）「革命（即是從一個社會制度轉變到另一個社會制度——著者）就是一部分人民用鎗斃刺刀壓迫和束縛他一部分人民的意志與自由的事實」：（註二）當馬克思正以為「無產階

級專政的時期

必先把握資產階級政權，然後再行革命。兩方是相輔相成。

級應該用暴力根本消滅資產階級而創造自己國家的基礎」；(註三)「巴黎公社特別明顯的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攪得原有的國家機器，而利用之達到自己的特殊的目的」；(註四)工人階級「應當打碎這部舊機器，這正是大陸上一切真正民衆革命的先決條件」；(註五)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時却提出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不流血，不破壞資產階級的機器，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用和平手段達到的觀念。

(註一)見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引馬克思的話。

(註二)同上。

(註三)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

(註四)見馬克思與恩格斯一八七二年所題的『共產主義宣言』的序。

(註五)見馬克思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二日致庫格兒滿的信。(列甯在『國

家與革命』中曾引用之。

一八七五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不顧巴黎公社的經驗，與馬克思對於公社的估計，在其哥達綱領上關於國家問題一節，不把無產階級專政提出作為黨綱的問題（以爲不必要武裝毀滅舊有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提出『自由的人民的國家的要求』，這國家恰是建築在階級統治的基礎上的當時的普魯士的國家。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這種要求加以殘酷的笑罵，稱之謂『關於國家的笑談』，以爲這種無稽之談，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事變之後，應當根本的拋棄；同時斷言『凡是說自由的人民國家』的人『都是蠢才』。

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國家的實質，根本沒有正確的了解，所以在哥達綱領中不能提出關於專政及武裝奪取政權的問題，是毫不奇怪的事。

這些問題在一八九一年在葉文格利亞的第二國際會議上所通過的愛爾福特綱領上同樣的未曾提到。在這個綱領上沒有一個字提及無產階級專政，甚至於民主共和國的問題都沒有提到；『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形式的最後形式，在

這種形式的國家中，應該瀰漫着最後的堅決的鬭爭」。(馬克思)。

一八九二年第二國際的傳教師攷茨基在其對於『愛爾福特綱領』的註釋中，企圖用雙料的機會主義的精神提出，和解決關於一種社會制度轉變到另一種社會制度的問題：『這種革命（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著者）看在某種條件之下來完成，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無論如何他絕不一定要用暴力與流血。在世界史上已經有過這些事，當統治階級特別的自覺與自量時，特別的沒有力量而發生戰慄時，自動的把政權轉讓給他們認為必要的人們』。(註)

(註)見攷茨基的『愛爾福特綱領』。

此地已經很明顯的表示出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關於政權由資產階級手中轉變到無產階級手中的問題之機會主義的地位。這種轉變在攷茨基和整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看來，並不要堅決的武裝鬭爭的結果，並不要經過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和平的順利的漸變的結果，而是經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化。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關於暴力作用的觀點至死未嘗有絲毫的變更，很普遍的流言，據說好像恩格斯在馬克思的『法國國內戰爭』一書上所寫的序言中（時在一八九五年，恰當恩格斯死的那一年，故這篇序言被人看作恩氏的政治遺囑。），變更了過去自己對於武裝暴動的『暴徒的』觀點，拋棄了一八四八年與一八七一年的鬪爭方法而變成和平改革的同情者；及梁尙諾夫同志很費力的從伯恩斯坦處拿到恩格斯序言的真正底稿以後，誰也不致再被這種流言所騙了。

恩格斯在這篇序言裏，說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國革命家的任務的歷史性，和在將來無產階級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必要的任務這些地方，統統被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編輯先生們刪去了之後，才把序言發表出來。

恩格斯對於鬪爭要採取暴力手段的問題之真正觀點，從他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致拉法爾格的信的一段話當中，可以明顯的看到。在這封信當中他嚴厲的反對人們對於他在馬克思書上的序言的曲解。當時他寫到：『某君（註一）……和我惡作

劇。他從我在馬克思關於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國所作的文集上所題的序言中。把一切能够辯護他在很久時期（特別是在柏林正在準備特別法令的時期）很高興宣傳的絕對和平的與反對暴力之策略的話，拿出去作宣傳的材料。其實我介紹這個策略（即暫時放棄武裝鬥爭的方法——著者）僅僅爲的現在的德國。然而即此一點也還加了許多具體條件的限制。在法，比，意，奧不能一律採用這個策略，就是在德國或許明天牠便不能適用的。」（註二）

（註一）恩格斯所指的某君即柏恩斯坦。

（註二）從馬克思恩格斯文匯第一卷中摘錄的。

改良派假造恩格斯的遺囑，爲的是要用他的名義作面具而實行可恥的機會主義的事業。最近十五年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實際行動（這裏當然用不着列舉事實），再明顯沒有的證明牠是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保衛人。現在誰也知道，社會民主黨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但牠贊成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採用暴力。

據上所說，可以看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跟着牠背後的整個的第二國際，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問題始終未能站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自哥達，愛爾福特，以至假造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專政，武裝鬥爭及一般階級鬥爭問題的著作（這些問題是真正革命者與假革命者的分水嶺），招致到現在這樣可恥的破產，關於這一點，列甯說過：『……人們時常的這樣寫和這樣說道：一馬克思學說中最主要的是階級鬥爭。這是不對的……承認階級鬥爭的人，還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在資產階級的哲學和政策的影響之下。承認階級鬥爭，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方是馬克思主義者。機會主義不承認階級鬥爭中的最主要的階段，即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即根本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事實上，這一時期是階級鬥爭最劇烈的時期。當這種鬥爭採用空前未有的劇烈方式時，這時期的國家不可避免的要採取新的德謨克拉西的形式。』

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及國家作用的問題，不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的

立場提出：所以他從來未曾提過武裝暴動的問題（當然更說不上事實上實行武裝暴動了）。

我們特別說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牠對於暴動問題的關係，因為牠過去和現在都是整個第二國際的思想上的領導人，此地一切關於牠所說的話，事實上即等於對所有加入第二國際的政黨所說的話。

「武裝暴動是一種政治鬭爭的特別形式，自有特別的公律，應當細細的考察的。馬克思說：「暴動和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這句話裏包含着很明顯的真理」——列甯。

## 一 暴動的條件，時間的選擇

列甯不僅在理論上恢復了馬克斯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眞面目，他並且在事實上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提出這問題作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鬪口號。列甯充實了馬克斯主義的內容，他『發現了』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

還在一九〇二年，列甯對於暴動問題（見他的『做什麼？』一書），即特別指出準備行將到來的暴動的必要，當一九〇五年暴動的環境成熟了，他盡他的一切權威和力量指示出，只有武裝暴動——最劇烈最堅決的鬪爭形式——的結果，能使無產階級得到勝利。

當核算莫斯科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總結時，列甯嚴厲的反對爲『所有的機會主義者』所欣賞的普列哈諾夫的著名的格言：『不要拿武器呀』。列甯所作的結論是：『批評和教訓我們的黨及整個的無產階級』，『應當堅決的，積極的，取

攻勢的奪取武器。應當向羣衆解釋僅僅一種和平罷工的不可能，及勇敢的，堅決的武裝鬥爭的必要。現在我們應當……向廣大羣衆作武裝暴動的煽動，不要拿什麼「準備階級」的話來遮蓋問題的本身。不要玩任何花樣；使羣衆不了解將來進攻的直接任務一定是流血的拚命的鬥爭，簡直是自欺欺人」。(註)

(註)見列甯的『<sup>十月</sup>莫斯科暴動的教訓』。

曲解馬克斯主義的專門家（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與立憲民主黨及其他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黨，同聲同調的罵布爾什維克爲布朗吉主義者(註)，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回答他們的文章中，對於武裝暴動及暴動勝利的條件問題定下了一個模範的公式：『第一，暴動如果要勝利，應當不憑藉一小羣黨徒，不憑藉黨，而憑藉先進的階級。第二，應當憑藉民衆革命的高漲。第三，暴動應當憑藉正在滋長的革命的歷史的緊急關頭，即當民衆先鋒隊伍的積極性最大時，即當敵人的營壘中和柔弱的，不徹底的，不堅決的革命的朋友的隊伍中發生動搖最劇時。對於暴動問題提

出這三種條件，這正是馬克斯主義與布朗吉主義的不同。列甯又接着說：『如果這些條件已經具備，還對於暴動（對於藝術——即在政治上與軍事政治上準備暴動——著者）取否定的態度，則無異於背叛馬克斯主義，背叛革命』。

（註）布朗吉是十九世紀後半期法國的革命家，他的主義的特點是：希望以一小羣勇敢的革命者的暴動而奪取政權。不了解經濟鬥爭和羣衆的無產階級的組織的意義等等。（譯者）

誰都知道，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列甯簡直是暴動的主腦，革命的靈魂。這裏已經把勝利的暴動的必需條件簡單的和一般的說明了。然而，列甯在他的『告同志書』中，對於馬克斯主義和布朗吉主義關於暴動問題的區別。曾經更具體的，更事實的指明出來：同時，並特別指出暴動在那些條件之下方能勝利。『軍事變亂是布朗吉主義，假若牠不由一定的階級的政黨來舉行，假若牠的舉行者不會估計到一般的政局——特別是國際環境，假若沒有客觀事實證明這個政黨能得民

衆大多數的同情，假若革命事實的發展還未曾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妥協的自願的心理加以事實的反駁，假若被公認的權力機關（如革命鬪爭的機關——蘇維埃等）的大多數還未抓住，假若暴動的口號（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土地歸農民』，『立刻取消秘密條約外交，在一切作戰人民間立刻樹立起德謨克拉西的和平』……等等），還未普遍地流行，假若先進的工人還不相信羣衆無出路的境遇，假若工人還不相信他們能得到鄉村的援助，假如國家的經濟狀況還有用和平的和國會的方法來解決危機的和平願望』（註）

（註）見列甯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策略』

一九一五年列甯在『第二國際的崩壞』的小冊子上關於這個問題曾寫道：『沒有革命的形勢，革命是不可能的；同時，也並非所有的革命形勢都引起革命；這對於馬克斯主義者是毫無疑義的。一般說來，革命形勢到底有什麼特徵呢？假若我們指出下列的主要特徵，或許不會有錯誤的：（一）統治階級在原有形式之下沒有

維持自己統治的可能；這樣或那樣『上層的』危機（統治階級的政治的危機），引起被壓迫階級的不滿意和憤怒。通常革命的到來，僅是『下層不願』忍受舊式的統治還不夠，同時，還要『上層不能』按照舊式的統治而生存。（二）被壓迫階級的窮困與需要的劇烈迴非尋常可比。（三）因爲上述原因，使那些在『和平時代』安然不受掠奪，在多事之秋被一般的恐慌環境和『上層階級』的本身把他們捲入漩渦的群眾的積極性格外的提高，而獨立的去進行歷史的事變』。

『按照一般通例，沒有這些不僅不依各種派別政黨的意義爲轉移的，並也不依各階級的主觀意志與轉移的客觀的變動；革命是不可能的』。（註一）

（註）見『反對派別』一書中的『第二國際的崩壞』一文。

對於暴動的勝利必須有上述的社會政治的條件問題，列甯曾在三申述過。從他的文集中可以找出許多這樣的材料，證明他對於革命的一般政治的條件的問題看得是有何等的重大的意義。列甯時時是根據這些決定革命環境的成熟的程度之條

件來解決策路上的問題：黨應當直接組織暴動呢，或是暫作動員革命羣衆的工作以靜候最有利於暴動的良機呢？

無論什麼時候，列甯未嘗把暴動看成與階級鬭爭其他各方面不發生聯繫的行動。暴動是由某國內一切過去的階級鬭爭準備起來的，暴動是這些階級鬭爭的有機的繼續。革命政黨的一切活動：爲和平的鬭爭，反對干涉中國等，反對在歐美正在成熟的帝國主義的大戰，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化；爲加增工資，社會保險，提高無產階級一般的生活程度而奮鬥，要求土地國有，作國會鬭爭……及其他等等，其深遠的目的都是在準備和動員羣衆以便在革命高漲時，他們走向鬭爭的最高形式——暴動。

從理論上分析舉行暴動有勝利的可能的必要條件，這是一件事；從事實上估計革命環境成熟的程度，及根據這種事實的估計而決定開始暴動的問題，則完全另是一件事，是一件比較複雜的事。這個問題——關於暴動時期問題，有絕大的意義

。例如，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四日布朗吉主義者在巴黎組織暴動，羣衆不幫助暴動者以致結果失敗了。經過三星期之後，在謝當(註)被普軍蹂躪之後，九月四日整個的巴黎暴動起來了。當布朗吉主義者舉行暴動時，羣衆中的發酵已經很大了，統治階級的腐壞已經顯著了。然而沒有一個相當的推動力使羣衆走向有力的行動。謝當恰是個推動力。布朗吉主義者未曾顧慮到這一點，暴動的時期選擇得不恰當，以致受了失敗。

(註)謝當 (Sedan)，法國城名，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被普軍蹂躪，成爲法帝國沒落和共和成立的信號——譯者。

一九一七年七月列甯格勒一部分革命的無產階級希望暴動並且曾實行暴動以推翻臨時政府。以列甯爲首領的布爾什維克黨曾經告訴羣衆說：『還早咧』。七月三日至五日的暴動遭受了失敗，到九十月間，雖然黨的中央對於奪取政權問題有過很大的分歧，列甯却絲毫不動搖的說：『馬上就幹，或者不幹』，『革命要死亡

的』，同時發出許多含有軍事政治和軍事技術性的命令，指揮盡可能的實行有把握的暴動。試看列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怎樣估計一般的環境：『七月三日至四日，這樣的提出問題，或者也並非罪過；到不如痛快的奪取政權吧，因為，即不如此，敵人也是一樣的加我們以暴動的罪名而以暴動者來處理我們。但從這個地方並不能就作出個結論說，那時候奪取政權是有利於我們的；因為使暴動勝利的客觀條件還未具備；

(一)革命的先鋒隊伍的階級那時候還未贊成我們，在京城的工作人與兵士中，那時候我們還未佔多數。現在我們已佔有兩方面的蘇維埃……(工人與兵士蘇維埃——譯者)

(二)那時候還沒有全民衆革命的高潮。現在在可爾尼諾夫之流(註)進攻後已經有了。許多省及地方蘇維埃已奪取了政權，便是明證。

(註)可爾尼諾夫是反革命的將軍，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率領哥薩克進攻

(三)那時在我們的敵人中間和不在澈底的小資產階級中間，沒有嚴重的一般政治的動搖。現在則動搖非常的大：我們主要的仇敵——全世界聯盟的帝國主義，因為『聯盟國』的領袖是國際帝國主義——對戰爭到底或分別構和以便反對俄國的問題發生很大的動搖；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很顯明失掉了大多數民衆的同情，因而發生了急劇的動搖，拒絕與憲法民主黨聯盟。

(四)因此，七月三，四兩日的暴動是錯誤的：我們無論在物質上，在政治上均還不能掌握政權。在物質上雖然彼得堡曾暫時落在工人的掌握之中，但那時候的工人和兵士還沒有爲佔領彼得堡而誓死作戰的決心；還是沒有這樣的『成熟』，人民對克倫斯基，測涅切尼，及切爾諾夫（註）的忿恨還未沸騰到極點；我們的人還未嘗受過有少數派及社會革命黨參加的壓迫滋味之經驗的鍛鍊。在政治上，我們在七月三，四日還不能掌握政權，因為軍隊和各省在可爾尼諾夫之流的事變以前還是跟

着彼得堡的動靜走。

(註)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內閣總長。……測望切尼——少數派，二月革命時有很大的作用，現在是第二國際的首領之一。切爾諾夫——臨時政府的農政部長，社會革命黨黨員——這三人現在都是反蘇聯反革命的鍵將。

——譯者。

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贊成我們的有能够吸收群眾的革命的前鋒階級之大多數。

贊成我們的有民衆的大多數，因為切爾諾夫的去職，雖然不是唯一的，但是一個最顯明的徽號，就是農民從社會革命黨的聯盟中（就是從社會革命黨本身上也是如此）得不着土地，這是革命的全民性的中心問題。

勝利屬於我們的，因為民衆已經完全走近拚命作戰的地步，我們只指示民衆以『正確的道路』。註）

（註）見列甯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一文。

從以上這些引證的列甯的文章裏面，可以看出列甯當決定暴動開始的問題的時候，對於使暴動有勝利的可能的一般政治的條件的問題看得是何等重要。列甯在七月間對於環境的估計，毫無疑義的是非常正確的。黨沒有獲得民衆多數的贊助，敵人的動搖程度還未達到十足『被壓迫階級還能在舊制度底下生存，統治階級還能把舊制度來實行統治』。在兩個月的過程中，環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們的黨已獲得民衆大多數的贊助，於是列甯又堅決的決定暴動開始的問題。有些同志（加米旭夫，季諾維埃夫等）的意見是完全不正確的，他們以爲列甯的主張可以使革命趨於死路。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黨曾指定一定的時期（俄歷十月十五日）開始暴動，然後又改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開幕時的俄歷十月二十五日（公歷十一月七日）。在列甯格勒及其他重要城市的十月暴動完全是按照一定的計劃進行的。革命的時期是不能指定的，然而暴動（據以上所說的各個例子）則不僅可以而且應當

指定一定的時期；但是有個唯一的條件，就是暴動時期的指定人在羣衆中要要極大的威信，同時，更能正確的估計環境。

列甯在九月已明顯的看到，民衆大多數贊助布爾什維克的激黨，他正確估計了環境，知道暴動的時期已經來了。他放量到我們的黨不僅對俄國無產階級，而且對全世界無產階級有偉大的機務，他深恐空過了有利於暴動的良機，他深恐環境可以根本改變到有利於統治階級而延長了奪取政權的時期。由此，可知列甯爲什麼這樣堅強的自信而主張在十月暴動說『馬上就幹，或者不幹』。

暴動從廣義上看來當然不純粹是軍事行動。首先就是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反對統治階級的有力的革命運動，至少也是無產階級中積極的戰鬥之一部，甚至整個無產階級中有組織的最少之一部的有力的革命運動；然而是在緊急關頭的積極分子大多數的有力的革命運動。工人階級中先進分子的武裝隊伍的軍事行動應當在革命運動最高漲時舉行。只有這種情形之下，暴動才能勝利。暴動應當是由黨

來組織的。政權不會自己送來的，政權是要奪取的。『衰老的政府……就是在恐慌時代也不會墜落的，假若沒有人來推毀牠』。(註)

(註)見列甯的『第二國際的崩壞』。

列甯在我們以上所引用的『告同志書』中，在分析保障暴動勝利的政治條件後，接着寫道：『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看待暴動是一種藝術，我們同時不要空過了一分一秒的時光，應當組織暴動隊伍的司令部，分配力量，調遣可靠的軍隊把守最主要的地點，包圍亞力山大靈加，佔領彼得堡炮台(註一)逮捕總司令部及政府機關人員，調遣能够決戰的隊伍去抵抗士官學校和負固的師團，不允許數人向城市中心移動，動員武裝工人，號召他們作拚命的最後的決鬥，立刻佔領電報局及電話局，把暴動的司令部安置在總電話局內，以便與所有的工廠，軍隊，武裝團爭各地點以及其他等等發生聯繫。』(註二)

(註一)亞力山大靈加——彼得堡大戲院名。彼得堡炮台在冬宮對面。

均爲暴動時必爭之地——譯者。

(註二)見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策略』

列寧不僅是革命的偉大的戰略家，他是比任何人都深切了解馬克思的『暴動是藝術』的格言內容的人，他並且藉其偉大的天才把他應用到奪取政權的實際鬭爭當中去。只因爲正確估計了暴動的時間與對於暴動的關係好似對於藝術一樣（即採取許多軍事技術與策略的方法），十月革命才有爆發的可能。

近來在各國無產階級爲奪取政權的武裝鬭爭的經驗，證明這些行動與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行動相差很遠。一九二四年十月的漢堡暴動，一九二七年二月的上海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暴動都是很好的例證。這些暴動的組織者未曾學得列寧主義的『藝術的制勝』，以致對於革命的成熟和環境估計方面，都作了許多事實難免的錯誤，結果這些暴動不會得到也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

### 一 涅維爾的暴動(註)

一九二四年秋季的愛沙尼亞的政治環境，在愛沙尼亞的其共產黨看來是有助於動的環境，職工會差不多完全是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在選舉城市自治機關時共產黨曾得全票數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工人階級的基本羣衆無疑義的同情於共產黨的口號。鄉村中的無產階級（僱農）及半無產階級分子主要的也是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但是共產黨並未能把他們組織起來，同時政府又處在不可遏止的恐慌的境遇，國家的經濟狀況衰落，工業凋敝不甚，結果致失業增加，引起一般人民對現存制度的不滿意。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共產黨即決定要暴動，並採取組織上，政治上的各種方法，準備武裝暴動，建立秘密的軍事組織，在軍隊中加緊了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在暴動的（十二月一日）不久以前，共產黨公開的發出暴動的口號並號召羣衆推翻資

產階級政府。

(註) 涅維爾 (中文地圖譯為勒佛爾) 是愛沙尼亞 (根據中文地圖譯音) 國的都城，愛沙尼亞於一九一八年脫離俄國而成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位置在芬蘭灣的南岸，面積一六·九五五方啓羅米突，人口一·一一〇·〇〇人，首都勒佛爾有居民一二三·〇〇〇人，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是愛沙尼亞人，其他為德，猶太及俄人，主要的是農業，國內五金工業，紡織業及造紙業均發達，共和國之首領為總統，最高權力機關是三年一選的一百個代表的國會。——譯者。

暴動是決定十二月一日在涅維爾及別爾諾夫兩城開始，在涅維爾的暴動計劃大體如下：十二月一日清晨軍事組織暴動起來，並且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最重要的政府機關：火車站，電話局，電報局，軍政部，解除涅維爾的高級軍官學校和初級軍官學校的武裝等等，然後 (或者即在暴動之時) 一定有幾部分軍隊轉變到暴

動者方面來，遼維爾居民中的無產階級成分也一定要對暴動者加以積極的援助。

暴動在十二月一日五點十五分開始了，軍事組織大約發動了二三〇個人，開始時多少會到得點勝利，但因許多難免的軍事錯誤（最主要的是暴動的人數太少），羣衆沒有積極的幫助，軍隊未曾向革命方面來，以致遼維爾的暴動在幾點鐘之內遭受了很大的犧牲，而被反革命的力量壓服下去了。

暴動在其他城市裏並未舉行。

愛沙尼亞的同志的錯誤，此處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愛沙尼亞的共產黨以爲工人羣衆的積極幫助，只是使政權出入意料之外的由資產階級的手中失去以後。暴動之前夜在涅維爾及各省並沒有工人羣衆運動，共產黨未曾號召羣衆到街上去，恐怕羣衆遭受政府先期的蹂躪，無產階級羣衆轉到極端的行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暴動之先並沒有任何形式的工人羣衆的運動，所以十二月一日的事變無產階級羣衆簡直不能了解。因此，暴動的本身，不僅對於

愛沙尼亞的資產階級是出乎意料之外，就是對於愛沙尼亞的勞動階級也是莫明其妙。甚至當政府屠殺共產黨員唐蒲時（唐蒲在暴動前數日被槍殺），共產黨也未曾號召羣衆到街上去，黨僅希望以一小羣勇敢的革命家奪取政權，並且完成全國勞苦羣衆總暴動的鬥爭，在這一點上，愛沙尼亞的共產黨犯了極大的錯誤，採用了布朗吉主處者行動的方法，如果我沙尼亞的共產黨，在警察的恐怖的條件之下，事實上不能動員羣衆和把他們推動到街上去，那麼，當然在十二月一日不應組織暴動，暴動的時間是不適合的，羣衆還未充分準備着積極行動，軍隊還未充分瓦解，還未能

在政治上贊助革命。

遑維爾的暴動並未得到鄉村的回聲，愛沙尼亞是個農業國，居民的基本羣衆是農民，因此，在愛沙尼亞如果沒有鄉村積極的援助，絕不要妄想以數量很少的工人階級舉行勝利的暴動；就假定涅維爾的暴動能够取得政權，但是，能否掌握政權及能否把政權的影響普遍到全國，恐怕還成問題。

在國際關係看來，德維爾的環境也不十分不好，德維爾的暴動恰發生在德國革命失敗的一年之後，恰當所謂德謨克拉西的和平主義的時代（英國的麥克唐納政府，法國的歐里哀政府，以及其他的聯合政府），我們固然不把這種國際環境看威臣維爾暴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但這種環境對於愛沙尼亞資產階級相當的有利和對於暴動有相當的影響。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據上所說可約看出，為資產階級作英勇鬥爭的愛沙尼亞共產黨員的主要錯誤，便是他們過於看重了暴動中軍事行動的意義，過於看重了自己的武裝隊伍的力量，過於輕視了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勢力。不懂得「只有羣衆能做革命」（撲列哈諾夫的話），「僅僅一個先鋒隊不能勝利」（列甯的話）。德維爾的暴動是沒有羣衆贊助的一羣敢死的革命先鋒身的英勇行動。

## 二 德國的三月暴動

三月暴動的理論基礎是被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所嚴重批評的『革命衝鋒論』。

(註)列甯評判這種理論爲冒險的理論。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德國中部的煤礦工人的革命情緒，比較其他各部高，政府已開始採用各種壓迫手段對待中部的煤礦工人，爲的回答政治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中央號召德國工人羣衆實行總罷工，並且由總罷工轉變到武裝暴動。在德國中部共產黨的口號發生很大的效力，中部總罷工爆發了，在罷工之後，有幾區組織了武裝暴動，但是，德國其他各區的無產階級未<sub>能</sub>幫助中部的工人，以致結果遭受了失敗。

(註)當時有幾個德國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提出『革命衝鋒論』，他們的論據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與十月革命，已展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共產國際唯一的正確策略便是以推翻資產階級爲目的的革命進攻的策略，這些『理論家』完全不了解列甯主義的觀點，據列甯主義的觀點看來，資本主義在其腐壞時代還有暫時高漲的可能，

在資本主義暫時高漲時代革命進攻的策略應該代之以其他比較合乎時宜的革命的策略。『革命衝鋒論』的發明者之一便是馬斯諾夫，因為他是極

左派的變節者，已被德國共產黨開除了。

德國共產黨中央過於重視了環境的革命性，牠不了解『千百萬的羣衆不會因黨的忠告而走向革命的（註一），僅僅一個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的階級，廣大的羣衆還未站在一定的地位之時，或者直接幫助先鋒隊，至少，或者對先鋒隊表示和平的中立，或者完全沒有幫助敵人的可能』，僅僅使一個先鋒隊去決鬥，這不僅是愚笨，而且是罪過』。（註二）共產黨未曾估計到，德國的無產階級自一九二〇年三月以來遭受了許多嚴重的失敗，一般的看來當時恰是自衛的地位，黨沒有相當的政治準備急於提出全國總罷工的口號（即奪取政權的羣衆革命行動的口號），是不能在羣衆中得到積極的回聲的。先鋒隊和一小羣工人階級走上拚命決戰的道路，完全未計算到工人階級的基本羣衆是否贊助他們，他們的行動是否成爲孤

立無援的行動。

(註一)見列甯全集第十四卷第一部一六一頁。

(註二)見列甯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七九頁。

此地可以看出德國共產黨所犯的極左的錯誤的程度比較愛沙尼亞的黨小，但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德國共產黨在革命暴動的準備上，對於羣衆的革命意義的輕視上，也同樣的犯了極左的錯誤。

### 三 漢堡的暴動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漢堡的暴動給無組織的暴動一個很大的教訓，德國中部——特別是在漢堡——的政治形勢，是比較有利於組織勝利的羣衆的暴動的。

漢堡的十六萬工人因為國家政治經濟的恐慌，生活在極不堪忍受的痛苦條件之下，已經脫離了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的影响，靜待共產黨的積極行動。漢堡無產階級

的主要部分是準備在其產黨的口號之下活動，積極的幫助共產黨，在漢堡及其附近都沒有政府的軍隊（軍隊是調到撒克遜利亞和退蒲靈基亞維持『治安』去了），在漢堡政府的武裝力量是五千個警察，一萬二千個法西斯蒂者。幾萬工人罷工了，共產黨有很好的軍事組織（如無產階級百人團——約有二千人——及純粹的黨的戰鬥組織，所謂『衛黨隊』）。

雖然如此，當十月二十三日暴動時，只有一百五十個拿着武器去參加漢堡整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除了很少數的以外，對於發生的事變都持袖手旁觀的態度，暴動是奉共產黨中央命令開始時，在二十五日也是奉他的命令停止的。共產黨中央一方面希望在暴動前召集工廠作坊委員會代表大會決定總罷工問題，同時又決定利用良好的機會（軍隊缺乏，工人階級革命情緒高漲）組織暴動，於是在十月二十日發出二十三日組織暴動的命令。然而，工廠作坊委員會代表大會在赫孟尼刺開會時，因為準備的不週到（到會的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及受社會民主黨影響的無罷工人

佔多數），以致對於罷工問題給了一個否定的決議，在赫孟尼刺大會後，黨的中央向漢堡的黨的組織下停止武裝鬪爭的命令。

共產黨中央當時把一切精力都用在撒克遜尼亞，因為在那裏的政府中共產黨有三個部長，他們是爲所欲爲（除開革命工作），對於漢堡暴動的準備與實行可以說中央一點也沒有參加，漢堡的黨的組織完全是孤軍獨戰，這對於漢堡整個事變的過程當然有很大的壞影響。

漢堡暴動失敗的原因並非僅僅是德區共產黨中央的錯誤。漢堡地方黨的組織，大暴動時所作的錯誤，也有極嚴重的意義。雖然工人羣衆有革命情緒，然而共產黨未能使他們爲奪取政權而積極鬪爭，這對於鬥爭的本身有決定勝負的意義，甚至於連無產階級百人團也未參加戰鬥。此外，還有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在漢堡有共產黨員一萬八千人，而在巷戰時出馬參加的只有一百五十個黨員，共產黨未曾企圖（或者不曾）組織和動員黨內的羣衆爲政權而鬥爭，所以黨的羣衆完

全未曾拿起武裝而參加作戰。我們以為在漢堡當時的暴動的條件實在是具備了的。重說一遍：在布阮德漢南（人名）指揮之下的德國共產黨中央，既發出開始暴動的命令，他對於這一鬥爭過程所應負的責任，實在比漢堡黨部所負的責任還要重大；然而如果漢堡的黨部在暴動開始時能取得羣衆的贊助，至少能取得無產階級百人圍的贊助，則中只錯誤或者不致於產生如暴動失敗後這樣的結果。

兒戲暴動，代替了廣大的羣衆暴動，『假若沒有鬥爭到底的決心，千萬不要以暴動爲兒戲呀』（馬克斯的話）。

德國共產黨中完全忘記了馬克斯這句名言，既已在漢堡組織暴動，就應該把暴動看成藝術，換言之，就應該很詳細的準備暴動，就應該盡其所能取得羣衆對於暴動者的援助，就應該把羣衆組織起來，就假定不能使德國其他各地起來爲奪取政權而積極鬥爭，然而至少應該向牠們作援助漢堡之廣大的煽動和宣傳。這些一切應做的事却一件也未做，漢堡的暴動怎能不失敗呢？

我們所以在這裏很簡單的把德國共產黨中央對於漢堡暴動的關係說明一下，因為這件事是一切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果，至少也是德國共產黨的指導沒有堅決的和一定的路線的結果，德國共產黨中央的這種路線是曾被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嚴厲的批評過。

#### 四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

#### 二日的上海暴動

這兩個暴動的條件與以上我們所引證的各個暴動的條件有分別，中國共產黨當時是與國民黨聯合，這種環境就形成了這兩個暴動的準備上和實行上的特點。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上海事件（如就暴動的實質的真實的真實意義上來看）是不能稱作暴動的。這是，就當時上海的環境及中國共產黨所通過的武裝行動的決議看，又不能不把他看作一個暴動的事變。

一九二六年十月間上海的情形是這樣：在十月十日武昌陷落後，吳佩孚失去了最後的藩籬；北伐軍把自己的主力開赴江西去抵抗孫傳芳的軍隊。孫傳芳的軍隊大都調到前線去抵抗南方的國民革命軍，浙江省長夏超乃與國民政府的駐滬代表鈕永鍵訂下了條約，並決定暴動反對孫傳芳。條約訂妥後，鈕永鍵便開始在上海作動員力量和破壞孫傳芳後方的工作，組織暴動以幫助夏超約定的暴動。這與共產黨當時所採取的路線適相吻合，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在夏超未決定倒戈之前，即決定當孫傳芳敗退和國民政府承認夏超之時，上海無產階級應該起來暴動以幫助國民政府佔領上海。共產黨當時並承認在這個運動中必須盡可能的吸收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智識分子參加。

鈕永鍵不僅把小資產階級成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且團結了中產階級的代表（前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等），同時，他並且抓住了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

共產黨組織了一百三十個武裝工人，兩千個沒有武裝的戰鬥隊，鈕永健由流氓

無產階級組成了三千六百人的隊伍，虞洽卿可以指揮五百個武裝商團員，這些隊伍就是暴動的武裝力量。

統一暴動的計劃是沒有的。統一暴動的指揮人也是沒有的；因為這些聯合戰綫的隊伍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願把自己的武裝力量服從別一羣人的指揮，每派都決定自己獨立指揮自己的力量。但是，暴動的日期決定由國民政府代表鈕永健指定。按照共產黨的計畫（商團及鈕永健都沒有預定的計劃），暴動應該在海員，五金工人，自來水工人，電氣工人以至紡織工人宣佈罷工時開始，應該動員十萬以上的人到街上去。

孫傳芳在上海的力量定：步兵營（一〇〇〇人），兩千多個警察，兩隻內河兵艦（有一隻是站在鈕永健方面的），與李寶章領率的第七十六旅，對於孫傳芳幾乎已經是沒有希望的軍隊），這一旅人是分駐在長江兩岸（上海與江北岸）。

十月十六日夏超統率着一萬人，正式宣佈投誠國民政府，十七日清晨，他調遣

一團軍隊來佔領上海，下午軍隊離上海僅十五個基羅米突（一基羅米突約合中國兩里）。此時，孫傳芳的第七十六旅的前哨已到上海（因為孫傳芳當夏超一團軍隊還未進攻上海時已先調七十六旅到上海來），同日，在上海附近七十六旅與夏團接觸，以致夏團不能向上海進逼，這時候恰是上海無產階級暴動最有利益的時候，但指導機關方面對於暴動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十月二十日黨的武裝隊與鈕永健的隊伍多多少少地準備着暴動時，但是，夏超的情形已經很壞了。二十三日清晨，鈕永健得到一個未曾證實的消息，謂孫傳芳的軍隊已被夏超打敗了，於是他便發出於二十三日夜至二十四日晨在上海實行暴動的命令，其實事實上乃是夏超的軍隊被孫傳芳擊破了。因為沒有任何計劃與指揮（原定以軍艦開炮為信號而開始暴動，但因某種原因並未開炮），結果暴動未曾舉行，僅僅有少數人與警察發生衝突，共產黨於二十四日晨五點鐘左右發出改期暴動的命令。

暴動組織者的主要錯誤是（暫時不說組織技術上的缺點，如：沒有暴動的計劃）。

與指導，沒有關於戰地狀況的報告……等），共產黨在那時候太過於看重了鈕永健的行動，事實上把暴動的領導權完全放棄給他了（暴動時期由鈕永健決定），黨自動的放棄了準備和實行暴動的獨立政策而變成了國民黨的尾巴了。然而共產黨也曾企圖把暴動的指導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利用鈕永健和商人們的力量作為輔助力。

暴動開始的良好機緣（十月十七日夏超軍隊離上海三十里之時）錯過了。黨在十七日未曾舉行暴動的理由，是武裝隊伍還沒有準備。然而當時上海的實際情形是這樣：如果共產黨號召上海無產階級舉行總罷工，如果上海無產階級對這個號召給予一個有力的回聲，那麼，雖然是舉行未曾充分組織完備的暴動，但可以斷定對夏超爭奪上海的鬭爭是非常有利的。此地可以看出共產黨輕視了罷工的意義，而且過於重視了軍事行動的意義（僅忙於編練武裝隊）。黨未估量到，夏超的軍隊於我們在上海內部編練武裝隊時可以遭受失敗，他的軍隊一失敗，則環境可以根

本變更到不利於革命。

四〇

這些就是共產黨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所犯的主要錯誤。

####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暴動

這一次暴動也與前次一樣，還是在援助北伐軍的口號之下進行準備的。當時上海的情形是這樣：南軍在前線軍事行動相當休息之後（孫傳芳在江西已完全失敗），在二月間開始作進一步的行動，希望根本剷除孫傳芳。二月十七日南軍（白崇禧軍）佔領杭州，孫傳芳軍隊在這地方受了嚴重的失敗，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南軍佔領了嘉興車站（距上海六十個基羅米突），中國共產黨中央以爲軍事地位是完全與南軍有利的，在此時特開中央特別會議，結果決定：如果南軍大約進到松江（距離上海六十里），在上海即宣佈總罷工並實行武裝暴動，暴動的指導責任共產黨完全擔負。但是，在二月十八日晚間，上海總工會積極分子會議一致決定，必須很快的宣佈總罷工並號召工人實行暴動：參加此次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雖然已經知

道中央決定在南軍進至離上海六十里時始宣佈總罷工，然而竟同意他們很快的舉行總罷工的決議。罷工於二月二十日開始了，牠是一個極大的革命浪濤，參加者達二十萬以上的有組織的工人。

十九日爲準備暴動前的組織工作（編練武裝隊，成立政府……等等），整忙了一天。

二月二十日開始傳出消息，謂南軍因等待後援，暫時停止進攻上海。孫傳芳計算到了這一着，便開始對於罷工工人採取殘酷的恐怖手段。此時在黨中擺着一個問題，即可不可以轉變到暴動；經過很長的爭論，二月二十日一整天之後，二十一日清晨通過一個決議，決定於二月二十二日十八點鐘（下午六點鐘）開始暴動。

然而此時上海的總罷工的情形已經大大地變劣了。在孫傳芳極野蠻的恐怖手段的影響之下，很大一部分罷工工人逐漸的恢復了工作，以致到暴動的那一天，罷

工人數已經是不出十萬人了（二月二十日是二十萬以上的人參加罷工）。

暴動爆發了，但是被孫傳芳的軍隊和警察鎮壓下去。

暴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暴動（武裝爭鬥）開始於羣衆革命運動往下低落，罷工逐漸減少之時，暴動的良好機會錯過了。二月二十日恰是暴動的好機會，但是這一天共產黨中央却忙着爭論去了。這一點決定了暴動的命運。

此地還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孫傳芳的政權竟能够破壞罷工運動，強迫罷工工人的半數復工，這些工人在罷工開始的不久以後，也就馬上恢復工作，那麼，可否這樣的推測，就是上海無產階級作堅決鬥爭的戰鬥準備還未充分成熟。我們不對這個問題給一個完全肯定的回答，但是，我們以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必要的。然而據我們看來，這種推測或者是不十分錯誤的。

## 五 廣州暴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暴動，無論如何不能拿來與我們上面所說的暴動——特別是上海暴動相提並論。這一次的暴動真正的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

在上海暴動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還是與國民黨共同行動的，但是在廣州暴動中，中國無產階級已經表示着他是一個獨立的階級的月量，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封建殘餘，爲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廣州無產階級已經可以在百餘萬人口的城市之中，奪得政權而支持至兩日之久。牠已經在全世界面前證明了中國革命以後的發展，將要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廣州暴動既然是失敗了，因此使我們必要研究與考察這些造成暴動失敗之原因的條件。在這裏我們首先便應當說明廣州暴動之社會基礎還沒有十分的廣大，並且暴動所選擇的時期是不大適當的。與着這兩個原因同時存在的，還是暴動領袖們所做出了一些軍事技術上的錯誤，這些東西便促成了廣州無產階級在去年十二月的失敗。

#### 四四

在廣州本地之羣衆的革命運動自然無疑義的是存在着的。羣衆在各種形式之下是參加了暴動的。但是與這種現象同時存在的還有另一種的無產階級的隊伍，如像包含五千人以上的黃色機器工會，他們不但沒有幫助着暴動的工人，並且站在反革命一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曾有千餘機器工人拿着武器幫助反動勢力以壓迫暴動），

雖然在當時已經有了一切總罷工的條件，但是共產黨並沒有採取組織總罷工的策略。因此黨便沒有利用到鐵路工人之革命的情緒，因此李福林可以利用鐵路由韶關將他的第十五師軍隊向廣州調回。

廣州暴動沒有與廣州近郊農民區域中之積極的農民運動相匯合。在農民組織有自己的蘇維埃政權的海陸豐一帶，則離廣州有二百五十基羅米突（約五六百里）之遠，自然在暴動的時期不能對廣州加以積極的幫助。這件事給廣州暴動以很大的不好的影響。

在廣州之所以能奪取政權的原因是因爲在暴動的時候張發奎在本城中之軍事力量是非常單弱的（在城中有兵士四千，警察二千）。張發奎的軍隊是派遣出去攻打黃紹雄去了。但因爲張發奎的軍隊與黃紹雄的軍隊事實上還沒有接觸的關係，因此，張發奎於廣州無產階級開始暴動之後，便可以將自己的軍隊調轉過來以壓迫城市中的暴動。李福林也是一樣的。至於破壞張發奎軍隊的工作，則除了在開始暴動之學兵團及警衛團一部以外，是完全沒有進行的。因此在張發奎軍隊中一點騷動也沒有發生，於是這些軍隊都毫無反抗的服從張發奎的命令，轉回廣州，很殘酷的壓迫廣州工人的暴動。

廣州暴動是爲優越幾倍的敵人的力量所壓倒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加以在廣州本身，特別在城市附近各區都沒有發生十分廣大的高漲的羣衆運動，這是紅色廣州崩壞之最主要的原因。暴動領袖們所做的一些軍事技術上的錯誤，無條件的對於廣州這次鬥爭之結果是有非常大之影響的。但無論如何這只是第二等的原因，

不能像有幾個同志們所說的，以爲這乃是主要的原因。

我們絕對沒有意思來反對來批評報廣州的暴動，但我們總是有理由來提出這個問題的：廣州暴動的日期決定於十二月十一號，十二月十一號是否是適當的？據參加這一次暴動的同志說，暴動應當發生於十二月十一號是絕對不能免的，因爲不如此則廣州的革命運動也同樣的要被張發奎壓迫下去，因爲在此時張發奎已經發出了命令，要調回他自己的、一師人到廣州，來解除當時在共產黨影響之下的學兵團的武裝。照張發奎的計劃，職工會也是應當搗毀的。這就是說在廣州要開始極殘酷的反動時期。

在廣州同志前而所擺着的問題，就是不參加戰爭而失敗呢，還是乘着有幾分勝利的可能（雖然只是臨時的勝利），而開始活動呢？廣州同志決定了的是暴動。我們認爲在各種關係上說來，十二月十一號不算得是暴動之順利的唯一適當的時期。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初聖彼得堡的狀況，是與當時廣州的狀況差不多。在我們上面所引證了的文章上，列甯關於七月三號至五號之事變曾說：『七月三號至五號的

時期是或者可以奪以政權的，因為無論如何敵人總是要加我們以暴動的罪名而以暴動者來處理我們的。從這個地方，並不能就做出個結論說，那時候奪取政權是於我們有利的，因為使暴動勝利之客觀條件還未具備」。列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對這種類似的問題，是用否定的方法解答的。

廣州暴動所選擇的時期是不大適當的。在當時比較更為適當的策略是需要將暴動的時期稍為延遲一些。要在這個時期中來奪取黃色機器工會，最低限度要使他中立，來牽動所有城市中的廣大的無產階級及城市貧民，來組織總罷工，來注意廣州市郊及一般廣東之農民中的工作，來加緊破壞與奪取廣州軍隊的工作。不是袖手的而是積極的進行革命的工作，最低限度也要等候到張發奎及李濟深等軍閥開始激烈戰爭的時候，在反革命營壘中開始自相殘殺的時候。我們覺得要這樣的決定問題，是比較決定於十二月十一號暴動更為適當些。

我們知道，廣州暴動雖然有他的偉大的歷史意義，但是在他選擇時期上，他仍

然與我們在上面所引證的許多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上海的第二次暴動，其他各國的）都有共同的錯誤。

### 三 組織暴動之正確的例

假使我們留心觀察一九一七年之聖彼得堡，莫斯科的暴動，一九〇五年之莫斯科暴動，以及一九二七年三月之上海暴動，則我們一定可以看出，站在社會基礎之預備上，在暴動時期的選擇上，這些暴動與上面所舉的例子是有很大差別的。

列甯在我們上面所引證了的那篇文章中曾說，因為在聖彼得堡及全國都有爲革命勝利之順利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統治階級的崩潰，勞動羣衆之鬥爭的準備，等等），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在沙皇海陸軍中進行破壞軍隊和在政治上取得軍隊的工作，因為造成了十分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如紅色先鋒隊，又因為選擇了一個順利的暴動的時間（在第二次蘇維埃開會而布爾塞爾克在其中得了大多數的時候）以及黨對於暴動之正確的指導，所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號在聖彼得堡幾乎是未曾流血而奪取了政權。當時所發生的唯一的比較嚴重的戰爭，僅只是在佔據

冬宮的時候，因為當時在冬宮中駐紮得有士官學生及婦女敢死隊。僅只是在聖彼得堡已經佔據之後，纔與爲沙皇將軍所指導而進攻聖彼得堡的反革命的力量，發生了嚴重的鬥爭。但是這些力量很快的被革命的力量肅清了，因爲很快的並完全佔據了聖彼得堡，自然給了無產階級以許多超過了反革命力量的優勢。

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之取得政權並沒有像在聖彼得堡那樣的容易。在莫斯科却流了比較要多的血並且也延長了好幾天之久。但這並不是說莫斯科當十月革命的時候，暴動的力量沒有十分廣大的社會基礎。莫斯科暴動時期之一個領袖白切同志在『紅色先鋒』雜誌上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當時贊成布爾塞維克黨的有『莫斯科工人階級的八分之七』。但在莫斯科奪取政權比較聖彼得堡要遲緩些，要困難些。其原因是：莫斯科的黨的組織沒有採取十分積極的方法以組成紅色先鋒隊和武裝他們，沒有努力於破壞資產階級之武裝力量的工作，同時莫斯科之工人階級在居住的區域上未能集中在城市中某幾個固定的區域以內，而莫斯科的資產階級

因爲他的特別的歷史條件的關係，要比較聖彼得堡的資產階級更善於鬭爭些。還有一種情形也不能不影響於莫斯科鬥爭之性質的，就是黨的指導機關不在莫斯科而在聖彼得堡；這自然對於莫斯科暴動之預備，組織及進行上都無疑義的是有影響的。但是雖然如此，莫斯科工人階級羣衆的革命運動高潮，特別當得到了聖彼得堡的政權已經轉入於革命政府之手的信息以後，是決不亞於其他區域及全國各中心的（也不亞於聖彼得堡的）。

一九〇五年革命雖然失敗了，莫斯科十二月暴動雖然也是失敗了，但站在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積極參加推倒沙皇政府的鬥爭之觀點上看，莫斯科暴動總算是個極大的教訓和演習。

我們看列寧怎樣描寫十二月暴動；「十二月七，八兩日，只有羣衆之和平的罷工，和平的示威。八號晚，亞克瓦尼吳孟被圍。九號上午，多情場中之羣衆爲騎兵所衝散，是日晚工人自衛軍駐紮所爲官兵擊破，革命精神反因之益壯。街上

之無組織的羣衆，很自然的開始在街上建設障礙物。

十二月十號，官兵對工人所設立的障礙物開始用炮兵射擊，街中羣衆亦爲射擊的目標。因此，障礙物便成爲可靠的東西了，並且不是單獨的而是羣衆的了。

所有的市民都走到街市上，全城之各個中心的地方，均設有連續不斷的障礙物。

官兵與武裝隊繼續日遊擊的戰爭，結果官兵疲困，使莫斯科省長都巴紹夫不得不請求外援。至十二月十五號，官兵之兵額，始漸非工人武裝隊所能敵。十二月十七號，沙皇政府之謝米諾夫的軍隊纔衝破了工人自衛軍之最後的營寨——普列斯尼。

由罷工與示威到零星的障礙物的發見，由個別的障礙物到羣衆的對障礙物的建設，和直到羣衆與軍隊的巷戰。經過有組織的領導，羣衆的無產階級的鬥爭由罷工而轉變到武裝暴動。（列甯，莫斯科十二月暴動之教訓，見全集第七卷，第二

部，第四十九頁）

我們試一看一九〇五年莫斯科這樣的形勢，可知牠與廣州及其他的無產階級暴動有天壤之別。在莫斯科暴動中之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暴動的羣衆性。羣衆照着自己的意旨而發起，『經過有組織的領導』，由罷工而轉變成武裝暴動。

就在這篇文章中，列甯估計十二月暴動中之羣衆的發起作用說：『客觀上之鬥爭條件的變更，需要由罷工轉變到暴動，無產階級比較他的指導者還要在先的感覺者，實際時常是先於理論的。和平的罷工與示威，很快的便感覺着不能滿足工人羣衆的要求。工人要問：以後怎樣辦呢？要求更積極的行動。建設障礙物的命令，發到各區域中實在太遲緩了，當時在中心各地是已經建設了障礙物，工人自己做了這些事之後，工人自己仍是不能滿意。工人問：以後怎樣辦呢？還是需要着更積極的行動。我們，無產階級的指導者，社會民主黨人，在十二月暴動中如一個不善指導的軍官一樣。他不善於佈置自己的軍隊，以致自己軍隊中之很大的一部分，沒有積極參加戰鬥。工人羣衆需要一種積極行動的命令來指導他們，

但是這種指揮是終於沒有得到』。(同上第五十頁)。

#### 五四

此處列甯指出我們黨當時的缺點，是在於黨沒有預先見到鬥爭的形式，將要轉變到最高的階段，轉變到暴動和巷戰，是黨對於這種羣衆鬪爭的形式沒有預備在開始暴動的時候，沒有給羣衆以適當的指揮。

莫斯科十二月暴動終於被反革命勢力壓迫下去了，這當然並不是因爲暴動沒有羣衆性質。失敗的原因，乃因爲在莫斯科無產階級積極活動的時候，而農民對於工人階級之革命運動沒有十分積極的幫助；乃因爲在莫斯科暴動之前並沒有適當的組織上的預備：乃因爲黨對於『客觀的鬥爭條件之變更，需要由罷工轉變到暴動』的感覺太爲遲緩；乃因爲革命的力量還不能使軍隊（農民）捲入革命的浪潮之中，所以軍隊仍舊是服從反動軍官的命令』。

我們必須還要說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上海的暴動。無論站在暴動之政治的與組織的預備觀點上，時期的選擇的觀點上，或是站在暴動之指揮以及進行暴動

之技術工作的觀點上，在中國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聯盟）之特別條件之下，這一次的暴動總算是最好的例子。上海無產階階在共產黨的指導之下，雖然在以前的兩次暴動中已經受了殘酷的壓迫，雖然受軍閥之空前的白色恐怖，但仍然是繼續着勇敢的有系統的準備新暴動。黨在職工會中，在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階羣衆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黨在事前組織了各階級民衆之代表會議，這一點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黨在鐵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還在暴動前十天，鐵路已經開始罷工，這使張宗昌運兵幫助孫傳芳之舉，發生非常的困難。黨同樣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組織武裝隊（計五千人），他們是上海無產階級之武裝力量。最後黨又堅決的決定了這一次暴動中之指導力量應當完全的屬於他自己。因爲他在勞動羣衆中間已經做了很大的工作，所以工人從當時上海之階級的互相關係看，黨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黨決定當着國民黨在杭州方面的軍隊到了松江，南京方面的軍隊到了常州（兩

地離上海都三十基羅米突)的時候，黨便號召上海無產階級起來實行總罷工與武裝暴動。三月二十一號早晨傳出消息，說南軍在這一天可以進城。共產黨得了這個消息，並看清了當時無產階級羣衆之革命情緒，因此便決定了在三月二十一號上午十二時宣佈總罷工，而在這一天的十三點鐘(下午一點鐘)實行武裝暴動。總罷工以及武裝暴動都是照着預定的時期開始。參加罷工的不僅只是工人，並且也有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會，小商人等)。城市幾乎完全寂靜了。

雖然敵人在武裝勢力上有非常之大的優勢(工人之五千糾察隊中，在開始暴動的時，候只有一百五十人有武裝；但敵人方面則有步兵旅，以俄國白黨爲教官的鐵甲車隊，還有上海警察)，經過了二十八小時的戰鬥之後，到三月二十二號晚，暴動勢力完全佔領了華界。在上海工人奪取了城市數小時之後，四月十二號事變的英雄——白崇禧纔帶領國民黨的軍隊進到上海。

這一次暴動指導之正確，在於他正確的選擇了開始總罷工及武裝暴動的時期：

在於他正任的把上海附近的軍事行動與上海城內之武裝暴動相聯合；一方面是當着上海勞動羣衆革命情緒之空前高漲的時候，另一方面又當着蔣介石的軍隊已經逼近城下，而使得敵人的力量極端紊亂的時候；最後，他又可利用軍事行動的方法以解除警察，山東軍閥及孫傳芳之軍隊的武裝。

馬克思的『暴動是藝術』的提綱，在上海暴動中也如同在一九一七年之聖彼得堡，莫斯科的暴動中一樣，很正確的，很適當的，在爲奪取政權的實際鬥爭中極天才的應用了。

假使我們由這些關於武裝暴動的有系統的簡單敘述中，來做一個一般的非常簡單的結論，則這個結論可以這樣說：並不是像涅維爾暴動之組織者所企圖的那樣，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軍事行動可以引起廣大羣衆之奪取政權的積極的戰爭，乃是廣大的勞動羣衆之強有力的革命的高潮來引起武裝隊伍之軍事鬭爭；武裝鬥爭（照着預定的計劃）應當從革命高漲和羣衆運動中來組成。純粹的軍事行動在武裝暴動時

期固然有很重大的意義，但無論如何在這種關係上牠只能有第二層的作用。廣大羣衆之強有力的革命高潮，纔是暴動之真正的社會基礎，纔是社會政治的真正柱石，只有在這種基礎之上，纔能組成無產階級先鋒隊之勇敢的堅決的軍事行動，以搗毀行將死亡的統治階級的國家政府的關機。武裝暴動應當選擇在革命最爲發展的時期，當無產階級及共同盟者（農民，城市貧民）之鬪爭的準備已經達到最高限度的時期，當統治階級特別是牠的武裝力量已經達到最渙散最薄弱的時期。

#### 四 暴動之組織技術之前提

以上我們所說的都是關於怎樣保證武裝暴動勝利之原則上的一般政治性質的問題。我們現在還必要更詳細地來說明在準備暴動及進行暴動的時候之軍事政治與軍事組織上的幾個要點，這個問題也是有很大的意義的。暴動與其他的軍事行動一樣，不是忽然間可以實現，而需要在事前有長期的有系統的預備，對待暴動者小與對待藝術一樣，假使在軍事上沒有各方面的嚴密的預備，即使當着一般的政治條件允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候，也是決不會實現一個勝利的暴動的。這種道理對於一切國家都是適用的，特別對於那些資產階級及一般統治階級已經在那裏有了長時的統治而造成了他的強有力的國家機關的地方。『暴動是一種藝術，與其他其他的戰爭一樣，與其他的藝術也是一樣。也是服從一定之規律的。忘記了這樣規律便可以使政黨走到滅亡的道路。』（馬克斯『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

估計國內政治環境的變遷，對於革命的政黨是非常重要的，黨要能够估計到政治環境轉變到這個時候，即當時共產黨可以起來為奪取政權而直接鬥爭，尤其重要的要能在適當的時間感覺着尖銳的命革形勢的行將到來，在適當的時間便在黨務，政治，組織上都開始做進行馬上暴動之預備工作。

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德國共產黨對於武裝暴動的預備太晚了。無疑的，德國之直接革命的形勢在法國軍隊包圍萊因河及魯爾區域的時候（或是直接當着包圍之後），便已經可以預先看見，因為從這時候便已經開始了德國之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由經濟危機所引出來的政治危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德國在這個時候便有幾個區域已經由工人羣衆自己的發起而組成了無產階級的武裝百人團。但是武裝工人的策略，武裝暴動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僅是當着八月三日的總罷工推倒了庫老政府（國家主義者的）以後才開始進行。時間已經很晚了。無產階級的百人團太匆促的組織起來，沒有取得充足武器，在軍隊及警察

中間的工作也是很薄弱，還有與此並存的其他的因素（註），於是不能不影響到一、二、三年秋季之整個的革命運動的果實。

（註）我們在這裏不用說那些在德國革命失敗上很有嚴重意義的德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詳細的說過了，在這裏所說的僅是革命的軍事政治工作方面。

另一方面假使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二月暴動失敗之後，不立刻預先看見了新暴動的成熟的條件，沒有在事實上做到了那樣積極的準備，則三月二十一號的暴動即令牠得着了勝利（因為有特別順利的條件），亦必無疑義的比較對暴動已有了謹慎的預備的時候，要忍受着更大的更酷的犧牲。

說到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黨也是一樣，在列寧歸國（四月大綱）以後，就是說從四月四號起，就決定了採取政權歸蘇維埃之堅決的策略。當然是用暴動的方法。自此以後，所有的黨的政治工作，以及組織工作，都是以便羣衆預備奪取政

權爲目的。假使黨在開始決定這種策略的時候更遲延一點，或者黨採取了以後季羅維也夫及加米涅夫（二人都是當時反對武裝暴動的——譯者註）的態度，那麼，將有怎樣的結果呢？自然呵，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說不上十月革命的勝利，因爲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順利的環境之造成，不僅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戰爭，經濟危機，土地革命等），並且也由於當時之黨的工作（對羣衆之革命的教育，在羣衆以及在軍隊中的組織工作等）。

我們由這些例子中便可看出，在一個適當的時間中對於革命發展之方向與速度的觀察，以及根據這種觀察中而決定是否直接準備暴動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們以爲在革命預備的條件之下，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與當着在革命成熟的條件之下對於暴動時期之選擇有同樣的重要。

## 一 在資產階級之武裝力量中間的工作

無論當時的政治形勢何如，各國共產黨軍事政治工作之一的首先任務便是要破壞與奪取資產階級國家中之武裝力量，在陸軍中，<sup>武裝</sup>警察中，海軍中及資產階級之志願的軍事組織（『義勇隊』）中，進行政治的與組織的工作（『義勇隊』）在他的階級成分上多半屬於無產階級的）。經驗告訴我們說，這些精通軍事的軍隊與警察，有最新的攻守的工具（機關鎗，毒器，航空器，鐵甲車等等）為他的武裝，以軍官為特別的指揮人才，在每個國家又有資產階級之『義勇隊』來幫助他，若是他們真正的來與革命鬥爭，則雖是當着具有革命勝利之順利的條件的時候，他們亦有消滅革命的可能。這一點由各個國家之武裝暴動的經驗所得出來的基本道理，是完全用不着任何爭論的。真正準備奪取政權的革命黨都應該來學習這個基本道理。

事實上假使在德國之軍隊與警察中曾做了很充分的革命的工作，則反革命的軍官絕沒有像一九二三年九月那樣容易的無阻礙的來震動自己的軍隊以包圍革命的撒克遜里亞及秋林吉。秋假使一九二四年秋在愛沙尼亞共產黨將牠當時在軍隊中所有

的影響從組織上鞏固起來（共產黨支部、革命軍人會等），則在溥維爾的暴動決不致於像事實上那樣快的被壓迫下去。最後，假使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對於張發奎，李濟深，李福林等的軍隊，就是說對於那些軍閥用以壓迫紅色廣州的軍隊，曾做了可靠的破壞他們的或在政治上奪取他們的工作（在這裏我們沒有說學兵團，這裏面廣州黨部是做了很大的工作的），則廣州暴動無條件的將有另外的結果。

另一方面，假使上海附近之張宗昌的軍隊沒有為蔣介石軍隊的進攻及鐵路工人之罷工所破壞，則自然又說不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號上海無產階級之勝利。假使布爾塞維克黨之『軍事組織』以及整個的黨，在二月革命至十月中間，沒有在沙皇海陸軍中有系統的堅決的進行破壞及奪取他們的工作，則自然也說不上十月革命的勝利。

在各國之直接革命形勢的成熟不僅是在有戰爭的結果以後才有可能的（戰爭之後當然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在資本主義仍然繼續着他的暫時穩定的時候，在『和

『和平的』的環境之下，也是有產生的可能。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工農之基本羣衆不能擁有充足的武器，在羣衆中也沒有充分的可能以知道軍事常識。無產階級在這種『和平的』環境之下所造出的自己階級的武裝力量，若想用以打倒資產階級的武力，則有許多原因是使無產階級不能成功的。

這種道理也可以拿到東方，特別是中國來說。在中國雖然是發生了不斷的軍閥中間的國內戰爭，但因為那裏軍隊之特別條件（僱傭軍隊，人民對軍隊之一般的仇視，軍隊中之離階級的成分等等），工農羣衆對於這種軍隊中的戰爭是沒有參加的，武器是沒有的，軍事常識也是不知道的。

因此，在準備武裝暴動之工作中，對於統治階級的武裝力量之破壞與奪取，及造成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的工作（關於這以後再說），無論對於東方各國或是對於西歐比較發展的國家，都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共產國際在自己的決議中曾經屢次指明在海陸軍中工作之重要的意義。但是

在許多牠的支部中，同樣在中國的支部中，在中國黨面前屢次事變的過程均擺着與軍隊武裝鬥爭的任務，因為行將到來的革命運動高潮，必不可免的應當提出組織與進行羣衆的無產階級武裝暴動的問題，——然而中國黨在現在和以前都完全沒有估計到共產國際決議之重要，而對於軍隊中的工作幾乎一點也沒有進行。

每個革命黨之基本的任務，就是他應當在集中羣衆的地方去進行革命的工作。在任何國家之資產階級的海陸軍中，都是集聚了數百萬的工農青年，這些人並不是比較工廠工人及某種農民要難以接受革命的思想，應當知道海陸軍及警察是重要的強迫工具，是資產階級（及其他各種）國家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重要的工具，因此無產階級在海陸軍及警察中間的革命工作，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能輕視的。黨若是直接或間接的拒絕了這種重要的革命工作，便對於革命的結果可以發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在蓄積革命實力的時候以及在革命高漲的時候，每個共產黨都應當不斷的進行這種工作。根據上述的理由，我們認爲這種工作並不比在職工會中的

在軍隊中  
工作比在工廠  
中

工作，奪取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工作要次要些。

沒有進行這種工作，或是這種工作進行得不充分，其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種工作是非常困難而且需要非常大的犧牲。特別是對於中國的僱傭軍隊，及幾個歐洲國家（保加利亞，德國等）的軍隊。不言而喻，軍隊中的組織系統，軍事紀律，軍隊離人民而孤立的狀態，這些都使着在軍隊中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但無論如何各個共產黨都應當要用很大的努力，堅決的勇敢的來進行這種工作。

經驗告訴我們，就是在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候，在軍隊警察中的工作，雖是有許多困難，但完全有進行的可能的。因爲自己之階級成分的關係，軍隊與警察在黨之正確的宣傳與煽動之下，他是決不能仍舊留於黨及無產階級之影響以外的。在全國革命高漲的時期中，軍隊必然動搖於革命及反革命的勢力之間。這種動搖就能够在牠直接轉變到無產階級那方面去。革命黨當直接革命形勢來到以前或當革命正在高漲的時候，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與組織工作愈是積極，則這種軍隊的轉變

也愈是多，愈是有力。

六八

說到共產國際文部對於在軍隊中工作之缺點，在這裏應當簡單的論到中國共產黨之錯誤。當即國民黨合作的時候（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中國共產黨有非常順利的條件，可以在國民革命軍中進行政治工作，使兵士羣衆革命化。但是中國共

在口口口口作時  
中共二大的時候  
（因爲他對於中國革命中之最基本問題採取的是投降的雙料的機會主義的政策，

所以對於在國民革命軍中奪取兵士羣衆的革命工作也完全沒有進行。試看一九二

五年廣東軍事委員會關於在國民黨軍隊中之工作大綱曾怎樣說：『我們在革命中的工作，不在於破壞國民黨的軍隊，而在於鞏固國民黨革命軍而保持其統一。……我們不應不在軍隊中進行我們的觀點與國民黨的觀點不同的政治宣傳而引起軍隊的破裂』。這一段對國民革命軍之關係的論調，可以看作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時自始至終的政策的一覽表，牠完全與中國共產黨在八月會議前之一個著名的領袖陳

中口左革命  
失敗的軍官

獨秀的觀點相符合。陳獨秀是說：『先要擴大革命，然後再深入』，就是說在國民革命還沒有打倒北方軍閥（張作霖等）和佔領北京以前，土地革命的發展，與國民黨政策不符的工人階級之革命運動的發展，在軍隊中之革命的工作（爲的是不破壞他的一致及不損害他的戰鬥力起見），也是不容許的。這些事情僅只有在北伐成功以後才可以實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從來沒有嚴重的提出，將來國民黨不可避免的要叛變革命的問題。因此共產黨僅只在軍隊中做了合法的工作，而拒絕在軍隊中組織秘密的黨的支部。因此在國民黨叛變的時候，他很容易將共產黨員由軍隊中趕出去，而我們黨在軍隊中表示出沒有一點組織上鞏固的影響。於是黨便失却了軍隊。

當北伐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甚至於完全沒有提出奪取革命軍中之軍官地位的問題，雖然在當時對於實現這種任務的條件是非常順利的。因此在國民革命軍中之共產黨員的軍官是很難以遇見的，有之則是幾個下級軍官棚長，排長，連長，至於

營長便非常之少了。一九二六年末命令葉挺當團長，與其說這是共產黨自覺的工作之結果，不如說這乃是李濟深當時的策略，但是事實上即是在葉挺這一團中，雖然這裏有很多的共產黨員，而實質上仍然是與其他軍閥的軍隊沒有什麼區別。在這一團中也沒有驅逐反動的軍官，在兵士羣衆中也沒有進行政治工作，軍隊中也没有政治機關。他的變動僅只是將這一團的領袖，用共產黨員代替了軍閥，在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指導時期中，未曾有一次提出將葉挺這一團擴充爲師，而在裏面設立政治工作的問題。僅只是在南昌暴動不久以前，才將這一團擴充爲師。缺少政治工作，沒有適當的政治口號，這是葉挺（及賀龍）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汕頭失敗之基本原因中的一個。

在北伐期中，黨員的數量雖然是很快的增長了，但是在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數目仍然是很少的。如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初國民革命軍計有九萬四千人，內中的共產黨員僅有一千二百人，其中有九百個是在留守廣東的軍隊裏。在一九二七年

中，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數目固然已經增加了不少，但是對於在軍隊中工作之指導是一點也沒有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指導軍隊中共產黨員的工作之中央機關。

在下層兵士羣衆中的政治工作幾乎是完全沒有進行的（若在有些地方進行了的話，則完全是當地軍隊中之共產黨員自動去做的），雖然黨的領袖們有時也記得這一句漂亮話：必要鞏固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之影響。士兵羣衆們往往不知道共產黨的存在，或是知道牠的存在而不能看見牠與國民黨的區別。黨的領袖們不注意軍隊中之真正的革命工作，盡量的去與軍閥將軍們做上層拉攏的伎倆，目的在保持軍隊中的一致，高談其左派國民黨之真正原則。

中國共產黨八月會議，對於舊時黨的領導機關對於國民革命軍之關係，曾在大纲中這樣說：『誰都知道武漢政府的軍隊大部分（一少部分共產黨員及受共產黨之號召而加入軍隊的工農除外）都是僱傭軍隊，與中國其他軍閥的軍隊是一樣，誰都知道，這些軍官的成份大部分是由地主及資產階級出身，其參加革命爲時是有限

制的，他們不過希望做一個較好的軍閥的奴僕而已，共產黨的領導者應該了解對這種軍隊的關係，共產黨的綫纜應完全以兵士羣衆爲標準，而不是以反動將領爲標準，共產黨應當在兵士與下級軍官中發展廣大的工作，在軍隊中造成堅強的基礎以資反對那些反動的將領。

但中國共產黨之指導在事實上完全與這相反。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一切政策與『工作』，都是與將軍們吊膀子與反動的軍官實行上層的同盟。軍實際上在軍隊中並未實行任何工作，也沒有想到要組織這種工作。軍這個問題雖屬重要，第五次代表大會並未單獨的考察牠。隊中央委員會的軍事委員會對於在軍隊中工作問題中的討論，竟遷延至四個月之久，迄無結果，然而與將軍們談判與將軍們吊膀子的事實却是無時無之。黨中國共產黨對於反動將領唐生智朱培德的策略，實屬莫大之恥辱。湖南政變及隨之而至的對工農羣衆之大屠殺，當然是事前已徵得唐生智之同意的——當然數星期前他已表示贊同這種政變的』。

中共領導機關對於革命中之這樣重要的問題，却採取了這樣的態度，這真是他對於中國革命一切根本問題之機會主義路線的直接結果。

這種結果自然使當資產階級轉變到反革命營壘的時候，留於革命勢力一方面的僅只有很少的葉挺及賀龍的軍隊。所有其他的國民革命軍都仍然服從那些反革命的將軍，遵照着他們的命令來搗毀工農階級的組織，槍殺工農運動的領袖等等。

再不能找出像中國當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那時候之在軍隊中進行工作的順利的條件了。現在在軍閥的軍隊中之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了，但決不是完全不能做。現在在那裏面的工作，比較以前共產黨員可以合法的加入軍隊當下級軍官的及政治工作人員的時候，在方法上自然要另是一樣。現在在中國之破壞軍隊及奪取軍隊的工作，在基本條件上當與西歐差不多。

在海陸軍警察憲兵中間工作之基本任務就在於努力吸引兵士海員警察加入無產階級鬥爭之共同的戰線上，企圖使兵士羣衆認識共產黨的口號與任務而接受之。

此外，共產黨還要提出這種任務，就是要為直接改良兵士之法律的與物質生活的條件而奮鬥（加餉，爭一般公民的權利，爭參加選舉的權利，改良伙食，反對死刑……等）。這些工作的方法——宣傳與煽動（口頭的及文字上的），實行的時候是要經過在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支部，革命兵士組，經過兵士委員會或其他的兵士的組織。在海陸軍中之這些組織的任務，就是要在革命之緊急時期中反對自己的軍官，組織所得的一部分轉變於革命勢力那方面去。『假使革命不是羣衆的，不能奪取軍隊的本身，則這個時候決議不上嚴重的鬥爭』（列甯，莫斯科武裝暴動的教訓，一九〇六年著）

在各個國家中在軍隊中之宣傳煽動及組織工作的方法將是各個不同的。每個共產黨要照着各個國家及軍隊的不同條件，找出適當的方法以進行這種工作。重要的在這裏，就是這個工作應當非常嚴重的去做，在軍隊中之黨的軍隊組織的工作，應當與黨日常所進行的政治工作發生密切的聯繫。

## 二 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組織

經驗告訴我們，僅用在軍隊中政治工作的方法，我們不能破壞整個的軍隊，獲得軍隊，使它來參加革命或是完全使它中立。某部分的軍隊永久是忠實的服從反動的軍官，積極的起來反對無產階級，則只有與他們作殘酷的血戰才可以破壞他們。列甯一九〇六年在『莫斯科暴動的教訓』一篇文章中寫了以下的幾句話：我們過去已經準備而且將來還須更堅決的準備『改造』兵士的思想，但是我們不會變成可憐的老先生，假若我們不會忘記，在暴動的時候我們還須要用血戰的方法以奪取。

每一支軍隊裏面總有一部分受過特別訓練的，由資產階級的子弟編集而成的（官學校，特別指定的人員等等）薪水特高的部隊，以外又有資產階級的志願的武裝組織（歐洲各國特別流行）。他們主要的唯一的任務就是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

武裝鬥爭。只有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解除這些部分及這些組織的武裝，才可以破壞他們。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按時建設工人階級的足夠的強大的武裝力量，以便與轉變到革命方面來的軍隊共同把舊政權的軍力打個粉碎。『革命軍隊之所以必需，是因為只有用武力才可以解決偉大的歷史的問題，而現代鬥爭中力量的組織就是事組織。』（列甯：『革命與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著，列甯全 第六卷 第二六七頁）革命的政黨必須多多注意到無產階級的武力組織。

每個國家內無產階級戰鬥組織的組織系統自然不是一樣的，但有一點是非常明顯的，這些隊伍必須建築在羣衆（工廠，作坊）的基礎上，人數必須是很多的。他們的組織系統多少是應與紅色先鋒隊及德國一九二三年無產階級百人團相像。

經驗告訴我們，在直接革命形勢之下可以比較很快的建設無產階級的廣大的戰鬥組織。照常說來，時間總以月計算。但是，只有在有相當數量的且是受過軍事政治訓練的中堅人才的條件之下，才可以很快的建設無產階級的羣衆戰鬥的軍事

組織。

一般說來，關於中堅人才的準備，中國共產黨沒有充分的注意到。但是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因為那兒的無產階級不能在軍閥的軍隊中去準備自己的軍事中堅人才。

各國工人武裝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武裝隊伍的組織的正確上，特別是在暴動時的行動上，暴動者犯了很大的錯誤，而這錯誤對於整個的暴動有很壞的影響，就是因為暴動者沒有熟識軍事的指導人員。

暴動的策略是非常複雜的，因為它有許多特點與常備軍的通常策略是不同的，所以學習這種策略須要長期的刻苦的研究。由是可知，革命的政黨，信從馬克思主義到底的政黨，應當看待暴動是一種藝術，在工人階級中宣傳暴動的政黨，必須認清訓練暴動領導者的任務，而決定方法以解決之。為要解決這個任務，共產黨不能等待直接革命形勢之來到（否則那就遲了），而要不顧國內之政治形勢立刻開

始這種工作。政黨必須遠在暴動以前開始積疊軍事中堅人才。我們可以用小組，學校（公開的，如公開不可能時則祕密的）的方法研究各國武裝暴動的經驗，或在黨的出版品中登載這些經驗，實際研究軍事（派人加入軍隊），在無產階級的公開或半公開的組織中工作（德奧的紅色戰鬥隊與法國的戰國隊革命同盟）。

如德奧的紅色戰鬥隊及法國的戰鬥隊同盟這樣的半軍事的組織，在未來暴動的領導分子的創設下，在無產階級羣衆的軍事訓練上，有莫大的作用。這些組織除了能訓練無產階級的戰士外，以國內戰爭的精神來教育他們外，又能担任破壞軍隊，警察，特別的資產階級的軍事團體的工作。這些組織既是無產階級自衛的戰鬥機關，又是國內戰爭的思想創造者及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的有方工具。凡是客觀環境應許這種半軍事組織的地方，共產黨都愛竭力創設這些組織。這些組織是革命軍隊的萌芽，因為一到直接革命形勢的時代，這些組織就成爲紅色先鋒隊，或無產階級的百人團。

青年羣衆的軍事訓練也可以用無產階級的公開組織來實現的，如體育團射擊組等皆是。凡是環境應許的地方，共產黨必須利用這些組織來更便有革命情緒的青年軍事化。

羣衆的軍事教訓（如打槍及暴動巷戰的最淺近的策略）如武裝，隊事組織的建設等等在中國現在有特別大的意義。那裏反動的恐怖非常兇惡，但是還須用適合的形式以求實現這種工作。廣州暴動已經告訴我們，積極參加武裝暴動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不會打槍，不會應用他們所奪取的武器。例如，工人拿着槍不知怎樣打法，或是打死自己的人，被奪取的三十架大砲只用了五架，而其餘放着不動，因為沒有人會開大砲。

中國共產黨過去的中央（八月會議以前）對於羣衆的武裝，對於無產階級武力組織的建設，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工作都是採取了極端機會主義的簡直是罪過的路線：關於工農武裝的問題，關於這種武裝的必需的問題，以及關於建設真正的工農的

革命軍事中堅人才的問題，中共中央毫無加以思索。中央的軍事委員會毫無有行動。全體共產黨員的軍事訓練從沒有提到，而這應是黨的第一任務，從沒有想到把各地的工農隊伍集合起來成爲有組織的力量，以便保護革命的向前發展，從沒有預先採用方法奪取武器以便分給工農。中共中央認爲工農武裝是不可實現的，或是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軍隊的上層分子的勾結是有妨害的。中央長期毫無行動後忽然積極起來了，但是這是反面的積極，就是中央向武漢的糾察隊發出命令，爲避免衝突及謠言計自動的解除武裝。中共中央對於這些重要問題的能度，難道不可以稱爲公開的取消派的態度嗎！

過去中央的領導，在中國革命的緊急機關，犯了有絕大意義的錯誤，現在應該完全把他們消滅。現在應儘量的把工人階級與革命農民（註）軍事化（即教育他們使用軍械，及同警察，軍閥的軍隊爭鬥的初步原則）的任務放在自己的前面，現在應該積極的積聚軍械的工作，準備將來軍事力量（在革命潮流的高漲中應該造成的

一)的中堅分子，現在應該立刻使每個黨員與青年團員軍事化。祇有在將要到來的決鬥的軍事方面實行上述的種種方法，祇有積極的在軍閥軍隊中去工作，同時盡力使無產階級與基本的農民羣衆革命化，中共才能完成領導將來羣衆的武裝爭鬥的任務，

上述的種種方法依照每一國內政治的形勢，及每一國家共產黨的一般任務，共產國際的其他支部，現在即應當或多或少地實行起來。

(註)至農民中具體的軍事工作以下即要說及。

### 二 黨在農民中的軍事工作

在農業與半農業國家的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勝利若沒有農民的幫助是不可能的，這尤其適用於工業方面落後的國家如像中國，印度等。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廣州的暴動等，已經分明的把這一點指示出來。列寧這一基本的論點，是誰也不能

否認的。在中國與同它類似的國家爲無產階級所領導之革命的最重要的同盟者，就是農民。祇有在革命的潮流推動廣大的農民羣衆時，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因此，黨在鄉村中的工作。它的意義並不亞於教育與組織無產階級的工作。因此，黨在鄉村中的軍事工作，同黨在城市內無產階級中的軍事工作有同等的重要。

一切農民的嚴重的革命運動，都發源於農民的游擊隊對地主，宮農，商人，高利貸者，反對徵稅機關，總之一句，反對鄉村與城市中現存政權，反對現存制度，主張沒收土地與分割土地，主張消滅地租與田稅，主張自己奪取政權的無組織的，自然爆發的武裝的爭鬪。在鄉農革命運動發展的第一階段，農民常常不能提出這類很明顯的農村革命的口號，他們祇是反對『不良的』地主，祇是主張『減租』與『減稅』。現在發展着的農民革命的基本特點，就是自然爆發的，散漫的（無組織的）農民的爭鬪，沒有一定的行動的政綱。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在農民方面的任務就是在得到農民運動的領導，給它以一

一定的方向，使它同國內工業中心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發生聯繫，不使單獨的，自然爆發的，散漫的與必然要失敗的農民的小暴動發生。

農民運動而沒有工人運動，等於工人運動而沒有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都是不能期望他成功的。這对有黨是毫無爭論的真理。組織鄉村與城市運動同時發生，這就是農業的與半農業國家內革命政黨的基本任務。

在軍事方面：共產黨在鄉村中的任務是同它對於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樣的。它須在各鄉成立農民軍事組織，這種組織在積聚力量的時期應該是農民反對地主反動力量的自衛的組織，它須教育農民軍事組織指揮官的中堅分子，它須練習使用武器與積聚武器等。在農村革命發展的過程中間，單獨的與人教很少的農民隊伍應該聯合而為廣大的農軍。

在中國，因北伐的結果，農民運動的發展很是擴大。中國共產黨（它的從前的領導），不去依照共產國際的訓令到農村中去工作，使運動在它的影響之下，採

取農村革命的擴大與深入的堅決路線，却來阻礙農民運動的發展，聯同國民黨去同所謂『過』（即農民的革命運動）爭鬥。還說這是從戰略方面設想是必需的（鞏固軍隊的接方）。在國民政府的境內，農民協會中的軍事工作，簡直完全沒有做過。祇是在國民政府的敵人的疆土內（河南與北方的一部），在農民的半軍事組織中（紅槍會等）才做了一些工作。這工作也是從戰略上設想，才認為是必要的：以為在敵人的後方使農民組織革命化，對於國民政府是有利益的。

中共在目前尚沒有廣大的革命潮流時，在游擊隊運動方面的任務，是在用日常的繁細的工作，在鄉村中鍛鍊出並聚積起革命的力量。使半軍事的農民組織（紅槍會，大刀會）革命化的工作，使革命的農民協會受到政治的教育與軍事化的工作，都是它現在應該做的。在接近大工業中心的農業區域中，動民中的工作，不論是政治的與軍事的，尤其應該特別緊張起來。必須設法阻止相互間沒有聯繫（不論同其他區域的農民動作或工人階級的動作）的小的農民隊伍的爆發。但當農民

運動自然爆發時，黨必須要立在運動的前面並且去領導它的。

在這一方面，共產黨做得很不好的例子，要算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的革命中，保加利亞共產黨的行動了。農民的暴動在很好的區域內自然的爆發，但是保加利亞的共產黨在整個期限內竟一點也不去領導這種暴動，農民的暴動因為它的無組織，無協商與孤立，被反革命的力量打倒了。

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農民暴動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保加利亞農民沒有正確的組織農民武力管理機關。因此就發生無組織的盲目的不協調的農民隊的暴動，同時因其迅速的瓦解，政府軍隊也比較容易的與之鬥爭。祇到了一九二四年初，保加利亞共產黨才開始按照下列的計劃產生農民武裝的組織：按鄉組織武裝農民團的下級支部，人數自十人至十二人；四五團應組成一排，四五排為一隊。農民武力的領導應由縣城的縣領導機關（司令部）執行之。實際上，產生這種組織的工作，沒有完全實現，因為自一九二三年秋季失敗後，革命的潮流，已經是往下退落

。但是這種組織農民武力問題的主體，不得不認爲是適當的。

同樣，在中國沒有充分正確的農民武力上的組織，及任何農民武力領導機關的組織，也就是中國農民暴動失敗的原因之一。這種情形在革命的農民軍隊方面是如此；而在半神秘的農民組織如『紅槍會』等等方面，也是如此。

中國農民的武力也可以照保加利亞共產黨在一九二四年所計劃的，並且已經開始進行的那種計劃組織起來，即：按鄉組織農民軍事組織的新支部，或十人團，每三四個人團編成一排，每三四排編成一隊，每部分應有指揮官一人領導之。爲領導隊伍起見，每縣應設立司令部以領導該縣農民的軍事組織。

同樣，應組織特別區司令部與省司令部（縣特別區，省的領導，得由相當的軍事委員會或軍事特派員執行之）。

革命的準備期中（積聚革命力量的時代）不應企圖產生偉大的農民武力。應該堅持產生爲數不多的，而政治上和軍事上鞏固的軍事組織，這種組織在革命高漲

時，應變成爲革命組織。

## 五 在工業城市武裝暴動的組織與技術

### 一 武裝暴動過程中共產黨軍事組織的任務

暴動的過程中，軍事組織的任務是：

一，對於敵人最重要的東西，在暴動向前發展的過程中有極大意義的東西，在略上最初即須給以打擊（如軍械處的搶奪，以保證有武裝革命階級的可能，對於（動勢力最忠實的武裝力量的消滅等）。

二，在當地黨委員會對於暴動的一般的領導之下，暴動時須有軍事行動的技術的指導者。

三，在軍事方面組織革命羣衆，以便暴動的過程中形成將來鬥爭的中堅。

在暴動的過程中，軍事的組織應該同革命的羣衆發生密切的關係。它的指導者與一切黨的組織，應該使革命的羣衆有充分政治的與組織的準備，便開始了武裝

鬥爭的軍事組織在適當時候得到民衆運動的擁護，保護暴動向前發展。這方面的沒有聯繫，或在革命民衆實際的軍事助力沒有到來以前，軍事組織會遭受單獨的失敗（如一九二三年德國漢堡的暴動，一九二四年愛沙尼亞涅維爾的暴動）。只是一個軍事組織，而沒有廣大民衆參加武裝鬥爭，武裝暴動是決不會勝利的。軍事組織的行動與革命民衆的軍事行動之聯繫，實爲武裝暴動過程中最複雜的，最重大的問題之一。

暴動者的武裝力量須能完全打倒崩潰的，動搖的與不堅決的國家的強制機關（軍隊與警察），並破壞純粹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法西斯帝國團體等）。

## 二 城市中常備軍與暴動者軍事行動的特點

### 常備軍戰鬥性的特徵

在統治階級手內最有力量的強制武器，便是常備軍。機關槍；追擊炮，裝甲

隊(裝甲汽車，唐克車)大大地增加了現代常備軍的戰鬥力量。

但是常備軍軍械的力量在戰場上空曠的地方，與白天)才能充分的應用。

都市中戰鬥的條件，很限制了常備軍軍械充分使用的可能，尤其是黑夜。因此，城市中戰鬥的策略同普通常備軍的一般策略是不相同的。

步隊 步隊是軍隊的基本羣衆，也是城市巷戰中最主要的一種軍隊。牠的主要工作，是在射擊的戰爭，佔據房子，區域，肅清暴動者，並希望消滅暴動者。牠更能保守已佔據的區域。

步隊在巷戰中的強點的：

一，有組織，有訓練，互相幫助與互相救護的習慣，同隣近部分發生聯繫的習慣。

二，武裝(不論質量方面與數量方面)比較暴動者要高明得多。

三，不但在城市的街道上能活動，即在庭園中亦能動作。

它的弱點：

一，步槍只能用於較近的距離。暴動者容易在室內，房屋後等地方避去火綫。  
二，不容易在城市街道上開展廣大的力量。作戰照例由很小的隊伍與集團舉行。

三，部隊直接同城市工人居民發生接觸時，不能不影響到他們的心理狀態。

適當的有組織『親近』（即城市居民去同軍隊親近）與煽動，如若軍隊在有革命化的客觀條件的政治形勢之下，會使軍隊解體，並使他轉到暴動者方面來。

四，從軍事行動方面看來，對於城市不大熟悉（尤其是初作戰時）。

五，時時有暴動者從窗口，在下室，屋頂樓，巷子襲擊的危險，暴動者的集團有出其不意向他進攻的可能。

六，在軍隊駐紮的地方，尤其晚上，暴動者在精詳的準備之下，可以向他作迅速不及掩耳的襲擊，他既沒有作我的準備，遂不能利用他的武器。

七，由工農與社會的遊離分子組成的軍隊，客觀上是沒有興趣來擁護那存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在中國是半封建的）制度的。兵士們並不是『自願去』作戰的，而是爲存在於軍營中的軍紀，嚴格的相互服從（由軍官與軍事法庭所支撐着的）所『強迫』去反對暴動的工人的。因此，非在軍官直接的監視之下便不願作戰的兵士與他們的集團，就變成爲『不可靠的』部隊了。政府常備軍在小團體行動之下戰鬥力量所以大減縮，原因也就在此。暴動者所以有最初消滅敵人軍官的必要（利用好槍手，與暴動者小團體的勇敢的進攻等），也就是爲此。

（炮隊）炮隊在城市中反對暴動的行動是困難的。榴彈炮，臼炮，與炸彈炮却是很可應用。炮隊可以發生很大的心理作用，這種作用對於居民與暴動者都是很不好的。但炸火對於暴動者物質上的損失，往往是不大的。這一點必須使工人在暴動準備中知道，使暴動過程中軍隊發礮射擊時，不致產生不好的心理的影響。

但是應該估計到，現代的砲火在直街上，在房屋低矮的區域中能毀滅任何『巴列加台』（即街道上的障礙物）。因此，必須：

一，不能把『巴列加台』直接看做防禦的工具，而祇看做敵人 步隊，馬隊，裝甲隊）進攻的障礙物。所以『巴列加台』必須作成：（一）深廣的壕溝，阻止裝甲汽車與唐克車的衝鋒；（二）『巴列加台』本身——用各種物件堆疊街道上（最好的東西為鐵絲網），阻止敵人生力軍的進攻，這些敵人必須由保護『巴列加台』的人用兵器消滅的。

二，『巴列加台』的武裝保護者，應隱藏於近旁的房屋內或地下室中，祇是少數槍手必須在『巴列加台』的上面。機關槍最好描準於馬路頂點的水平線（使死角縮小）。拿炸彈的人，最好藏在直接靠近『巴列加台』近旁，并靠近敵人方面的房屋內，從窗口將炸彈拋到接近『巴列加台』的敵人。同時炸彈手隱藏之處須在『巴列加台』防禦者的炸彈所能達到的地方。

（裝甲隊與唐克車）是街戰中有力的武器，在街戰的勝敗中有很大的作用。

唐克車與裝甲車，因有鐵甲的關係可以便管理者與其軍械受不到普通步槍與機關槍的危險。暴動者決不會有反對唐克車的武器。此外，唐克車會很順利的破壞「巴列加台」。所以如若暴動者不對於裝甲車取相當的辦法，它就會衝破暴動者的區域，引起恐慌與給暴動者以很大的損失。

要抵抗唐克車與裝甲車，暴動必須採用下列的方法：

一，在街道上掘取深廣的壕溝（依照唐克車的樣式而決定壕溝的深廣，廣從一。五米突（一個半米突）至三米突，深從一。五（一個半米突）至二米突。

二，將具有巨大炸力的手榴彈與炸彈拋到唐克車與裝甲車的下面。

一九二三年德國漢堡的巷戰給了幾個如何同裝甲車鬪爭的例子，那裏罷工工人的確表現出了異常的勇敢。兩架裝甲車接近了一個「巴列加台」，開始用機關槍射擊它的防禦者；同時在街道的另一端，暴動者很快的建築新的巴列加台，使裝甲

車在幾點鐘內不能自由行動了。在城市的另一區域內，裝甲車前進向巴列加台射擊，一隊警察站在街道的斜傾處，靜待射擊的結果。忽然一個工人從門口出現，跳近裝甲車，從車子的探望口一槍，打死了車手。於是放機關槍的人立刻離開裝甲車逃走了。

（馬隊）是城市中最笨重的力量，因為它只能在街上行動，而且很容易為人家射擊，所以在街戰中的作用很少。它只能應用於觀察還沒有被暴動者佔據的區域，孤立已經暴動的區域，克當傳達消息之用。

（航空隊）在街戰中可以為偵察與戰鬥（炸毀與射擊）之用。只要暴動者略為知道原始的隱藏方法（如簡單的利用地形），航空隊的偵察就不會有多大的成績。航空隊的軍事進攻，却可以產生很大的心理上的與物質上的損失（如對於廣場上與馬路上團聚起來的羣衆的襲擊）。

### 三 暴動者的力量與行動的特點

#### 甲。暴動者的弱點

(一) 暴動的無產階級的最大弱點，爲武器之異常缺乏。所以暴動初開始時，戰鬪員與工人羣衆行動應該是盡力於武裝羣衆。那些在暴動以前爲軍事組織時獲得的武裝，應該是最適當應用於巷戰條件的。這類武器，最初要算手機關槍（如湯普生式的，背爾根曼式的）了。這種武器在善射者的手內，不論在突然的襲擊或長期的巷戰中，都是有力的武器。同樣有用的，爲帶有較大炸力的手榴彈與炸彈。這些東西在不大的工場中可以自己用手藝的方法製造的。

軍事的組織與工人的羣衆應該使用他們所有的一切的武器。暴動最初發生時，暴動者應該備有爲奪取軍械（軍器處，兵工廠，解除警察武裝等）所必須的最小限度的武器。

(二) 大批的暴動者不能使用武器；其中有很多人（如在中國）從前向來沒有使用過武器，可以說是射擊也不會的。這尤其在廣東暴動中表現得明顯，那裏的工人羣衆在城市的爭鬥過程中才學習了駁殼槍的射擊。在奪來的二十種軍器中，暴動者能使用的只有五種（而且使用得也不高明）。愛沙尼亞涅維爾的暴動者得到了好些湯普生式的手機關槍，但因為他們不能使用，所以未將這些武器充分的應用。譬如奪取並解除軍官學校武裝的失敗之原因，就是由於他們不能使用湯普生式的機關槍。

所以教育武裝工人的射擊，尤其是關於較為複雜，較為有力的武器，如像機關槍的使用，實在應該十二分加以注意的。

(三) 在軍事方面，暴動者的準備，一般的說來，總是很不充分的。他們沒有那種常備軍所具有的軍紀。策略方面與作戰方面有經驗的指揮官差不多完全是沒有的。因此，暴動者大隊聯合行動的公開的作戰是不慣的。這尤其在中國，

因為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羣衆大多數都向來沒有經過軍營裏的生活

(四) 暴動的衆羣在戰鬥中是最容易受刺激的。就是暫時的小小的失敗，會對於他們發生不好的影響。所以經常的勝利是必要的。爲了達到這目的，必須將最好的力量集中起來反對最重要的對象。反之，對於會發生的某處的失敗，必須設法減少失敗印象(如及時的報告最主要地方的勝利等)。

#### 乙，暴動者的強點

(一) 對自己的勝利有絕大的興趣。因此常常發生羣衆的最高度的熱情，犧牲的決心，與最大的創造力。暴動者這些最可寶貴的性格，可以(A)完成最勇敢的進攻，(B)作小團體的巷戰，(C)對敵人所估據的區域爲突然的大胆的襲擊，(D)晚上發展作戰的行動等。

(二) 暴動的工人，因爲是本城的居民，可以很知道他們自己的城市(地方)與它的生活條件。知道城市的一切『進出口』，他們對於敵人所不諳的地方可以

作突然的襲擊，同時在暫時的失敗之下，很容易隱藏起來。

(三) 城市工人與革命羣衆常常站在作武裝爭鬥的暴動者方面，這給後者不但以物質上的幫助，而且也給他們以有力的精神上的幫助。

綜結上面近說的，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結論：

(一) 常備軍實爲不可忽視的戰鬥的力量。他們的戰鬪力最好應用於廣場上的與白天的鬪爭。城市的條件，雖不能給常備軍有完全應用它的武器的可能，但牠也還很可以作戰的。如軍隊的某部分（拿全國來說）不轉到暴動者方面來，暴動一定要失敗的。爲了暴動成功的保證，必須用盡一切力量，一切方法吸引部分軍隊（在暴動開始的時候）到自己的方面來。

(二) 對於政府忠實的軍隊，最好在他們還沒有準備好作戰，不能應用他們軍隊的力量時候，用突然進攻（向軍營）的方法，將他們消滅。最好用暴動的軍隊以工人隊爲後援）去對付政府的軍隊。

(三) 如若突然的進攻不能將敵人消滅，那最好用「巴列加台」與圍攻的方法將他們圍困起來（圍困軍營與他們所駐紮的地方）。

我們的任務是在孤立敵人，當在其他區域內暴動者正在組織武裝隊預備向被圍攻的軍隊進攻時，圍困敵人，必須；(A) 斷絕它同外界的關係（破壞交通工具等）；(R) 不給它飲料與烽火（破壞自來水管與電線）；(B) 組織小的暴動隊勇敢的進攻（白天·尤其在晚上），散佈對於暴動者有利的謠言等，來減少敵人肉體上與精神上的力量。

(四) 如若常備隊已開入城市，已捲入巷戰中，那必須採用：「巴列加台」的策略，將敵人前後擋住，用小的暴動者隊伍在軍隊駐紮地與作戰的地方做勇敢的進攻。我們的任務，是在用減少軍隊力量武裝進攻的方針，是在街道上用沒有武裝的工人羣衆同兵士「親近」的方法，是在用宣傳的方法，使政府的軍隊解體，使他們轉到暴動者方面來。

(五) 準備武裝暴動必須特別注意組織武裝工人小團體，並教育他們使用他們所有的武器。

## 四 武裝暴動的計劃

### 暴動計劃的必要

暴動必須依照預定計劃施行。在這計劃中當然不能預先看到暴動的發展，不能『預定』事件的經過，但在計劃內可以而且必要預先見到最初行動時暴動者力量的分配，預先定下每一暴動隊最近的與最後的任務。

暴動計劃應當預先看到：

(一) 那一區域（或那些區域）與那一目的物（或那些目的物）是主要的，在那裏暴動應該有無條件的勝利，這勝利對於將來暴動的成功有絕大的影響。

(二) 那些區域是次要的，不大重要的。

(三) 各區與各最重要的目的地暴違力量的分配，劃分出最大力量來攻打最重要的作戰的地方。

(四) 武裝隊完成了它的最初任務之後應該怎樣做（指點出以後的任務）：如若失敗之後，又應該怎樣做。

(五) 阻止政府軍隊從別的城市與區域調來的的方法（破壞交通，游擊隊的行動等）。

(六) 如何在暴動過程中實現武裝暴動隊向沒有武裝的工人羣衆間的合作。

暴動計劃的擬定應以下列諸點爲基礎：

(甲) 應明顯的知道社會的情形，依照居民的階級成分，它的組織程度與革命性的高低來決定那些區域可以作暴動的根據地。然後，一舉而佔取這些區域，把它作爲暴動的策源地。同時更應依照社會的關係來決定仇視暴動的區域，這種區域的消滅在計劃上必須規定下來。

(乙) 應知道常備軍與警察的力量與地位，軍械處在什麼地方，也應知道。

軍隊地位的變動，使暴動的計劃也不能不有所變動。因此常常報告政府力量變動的偵探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丙) 對城市各地應有策略上的估計，決定何處有利於進攻，何處有利於防禦。

暴動計劃給於每一個暴動隊伍及他的分隊有及時研究他們的初步動作的目的物，並準備武裝隊來完成已經定下的任務的可能；暴動計劃更使暴動的領導者有及時集中必要的力量（煽動的力量，武裝團的力量，武器等）來對付最重要的目的物的可能。

武裝暴動的組織與實行的計劃，應使黨與它的軍事組織有及時安排好組織的政治的戰鬥力量的可能。

從暴動的歷史<sup>史</sup>上，我們可以舉出以下的暴動計劃為例：——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漢堡的暴動)

漢堡有<sup>見之</sup>德國大工業都市，也是一個主要的海口，有人口一百一十萬，其中無產階級的成分佔百分之六十。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十月時在漢堡有黨員一萬八千人，他的軍事組織，約有二千人。

敵人武裝力量；警察五千人，武裝法西斯蒂（武裝的反革命者）一千以上。

覺得決勝負的革命事件的到來，漢堡共產黨的組織（以及一切德國共產黨）決定準備武裝暴動了。軍事組織除增加他自己的人數外，更開始研究敵人的力量。

因當時組織中最困難的問題為軍械異常缺乏的問題，所以當時最大的注意力是在如何發現敵人（警察與法西斯蒂的）軍械的祕密儲藏處，並研究如何有佔據這些軍械的可能。

暴動計劃的根本要點，可以歸納如下：

- (一) 用軍事組織的各隊之突然的與同時的襲擊去佔據已被發現了的軍械處。
- (二) 用襲擊的方法，解除近郊工人區域的警察與法西斯帶的武裝。
- (三) 已經武裝的隊伍，爲工人羣衆所擁護的，同時並舉的從近郊逼近城市中，將敵人（警察與法西斯帶）逼到南部，近河的地方。那裏的碼頭應由暴動者預先佔據，即在這裏將敵人根本消滅。

(四) 在武裝隊向城市中心進攻時，應佔據郵政電報局，主要的內外交通的車站，飛機場與其他重要的地方。這種行動祇有靠內應（這些企業中所有共產黨組織的發動）外合（借軍事組織活動隊的幫助）才行。

(五) 爲防止敵人外部援兵力量的到來，在離城二十五啓羅米突之處，安置伏兵并破壞道路。擔任這種責任的應該是近旁工廠與村落的地方軍事組織。

(六) 漢堡的暴動最初所計劃的並不是一個城市的獨立的舉動，而是全德國總

暴動（在可能範圍內同時舉行的）之一部分。漢堡的組織估計到十月二十三日將在全德國的暴動發生，實是有充分的根據的。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的涅維爾暴動

全部愛沙尼亞計有人口一百十萬人，愛沙尼亞是農業的國家，很少人口稠密的區域。京城涅維爾祇有十二萬的人口，涅維爾的工業無產階級，連運輸工人在內，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約計有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人，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失業工人。共產黨是處在極秘密的狀態之下，全愛沙尼亞約有二千黨員，在涅維爾的，約有五百黨員。

到十一月二日止，涅維爾戰鬥的組織約有四百人。

敵人所可靠的武力如下：

軍官學校及下級軍官學校

指揮官

約六〇〇人

約一〇〇人

警備隊

約 六〇人

武裝的法西斯蒂

約一〇〇人

共計八六〇人

因敵人的武力根本上要超越得多，所以惶維爾暴動的計劃就規定如下：

第一，突出襲擊軍事組織的主力，以消滅敵人有希望的活力（軍官學校，下級軍官學校，警察後備隊等等）。

第二，使那些對於政府少有希望的衛成軍與裝甲隊中立，然後使他們轉入暴動方面。

第三，暴動開始，即佔據最重要的行政中樞（軍政部與總司令部，警察隊，中央電話電報局，政府的房屋等等）。

第四，拆斷通至惶維爾鐵路橋，以延擱政府軍隊由鐵道運送至惶維爾。

第五，在惶維爾奪取政權之後，向愛沙尼亞最重要中的主要區域進攻，同時喚

起各地的暴動。

一〇八

### 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的暴動

保加利亞是純粹農業的國家。總數五百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

全國產業與運輸工人約計二十五萬，而無產階級都是散處於小企業之中。鄉村中計有十五萬農業無產階級，約有半數農民是貧農（平均農戶有土地百分之七十六〔迪武金〕，即不到一個俄畝。）

到一九二三年中葉，共產黨計有四五萬的黨員。其中大部分是貧農與農業無產階級。

到一九二三年九月止，真正集中的黨的鬥爭組織，還沒有形成。

全保加利亞政府的武力如下：

軍隊

二〇〇〇〇人

憲兵

一三〇〇〇人

俄國白黨

一〇〇〇〇人

法西斯蒂組織

約二〇〇〇〇人

共計六三〇〇〇人

保加利亞的暴動，主要的是靠鄉村的居民。

共產黨沒有整個的暴動軍事計畫，保加利亞的共產黨中央，趕不上事變進展的速度；暴動在保加利亞各區已經出現，而中央在整個的一星期中，祇是抓住事變的尾巴；第一次暴動於九月十三日在已有兩個縣城發現，而中央決議祇指定九月二十二日作總罷工。

因這種情形之故，各縣各州郡的組織祇有地方性的暴動計劃，其計劃的內容是：

第一，在居住鄉村人民的地點，奪取政權，就地組織農民軍隊。

第二，統一的農民軍隊，向縣城進攻以奪取縣城（同時，城市中由共產黨組織

以領導的工人，也起而襲擊城市。

第三，集中的向州郡的城市進攻。

因此沒有通盤考慮過的暴動軍事計劃，結果是：

(甲)在全國以及各省中，沒有發生受重要打擊的地點，因此之故，暴動方面武力的分配與政府方面武力的分配，形成對等的形勢。

(乙)不同時發生時的暴動，使政府得以集中的力量，局部的攻打暴動者。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上海暴動)

環境：南軍在離上海三十英里米突的地方。上海敵人的武力如下：

警察

約二〇〇〇人

山東軍隊

約三〇〇〇人

無產階級的力量：武裝隊約五千人，其中有武裝的一百五十人。

暴動的計畫

第一、三月二十一日十二點鐘開始總罷工。

第二、一點鐘後，即十三點鐘，舉行同時的，到處的，突然的武裝的襲擊，以  
解除警察的武裝。

第三、解除警察武裝後，立刻集合（在適時指定的地點）糾察隊編為軍隊，以  
與山東軍隊作戰，並奪取城中行政機關。

（廣州暴動）

廣州武力的關係如下：

政府的武力：

軍隊

約四千人

警察

約二千五百人

暴動方面：

教導團

二千二百人

駁殼槍和二百個炸彈（在暴動開始時只有槍三四十枝）。

廣東暴動的計劃的本質是想以在政治上被共產黨所握有的教導團以及工人糾察隊，突然夜間的襲擊，以解除政府的武裝力量（軍隊與警察），以武裝工人羣衆，由此在廣州建設蘇維埃政府。

## 五 武裝暴動中攻擊的對象

### 甲，奪取武器

暴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最困難的是供給戰鬥組織以充分的武器，說到武裝工人羣衆，當然還要困難。

德國共產黨的戰鬥組織在一九二三年秋，全國計有十五萬人，但武器（快槍及手槍）數量僅有十萬至十二萬的光景。

愛沙尼亞共產黨的戰鬥組織在涅維爾地方有四百人，其中有武裝的僅百五十人（五十支快槍，一〇〇支巴羅比魯手槍及數架「湯姆生」式的手機關槍）。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五千個戰鬥員，只有一百五十人有武器。

極少數的武器，不能滿足準備與現存政權作戰的工人羣衆的要求。因此，在暴動初期，主要任務之一是奪取武器及迅速武裝工人羣衆（首先是武裝戰鬥員）。

因此，軍事組織應按時發現敵人的軍械庫，及研究如何方能在暴動初期把牠佔領，及用暴動者充分力量（武裝的）去奪取武器。同時應用全力，以保證我們能即刻武裝無武器的戰鬥員及革命工人。此外必須估計到的，就是政府方面軍力的佈置與行動，因為他們是對抗及抵制奪取武器的。所以我們要奪取武器必須要反抗敵人方面防礙奪取武器的軍力，暴動者應用充分力量肅清這些敵人，或者當取得武器還未來得及武裝羣衆的時候，那末最低限度要牽制敵人的行動，以便取得武器。

## 乙，警察

警察不僅是反對暴動的國家武力，我們看來還是取得武器的來源。警察爲實行其功用計，必須要分佈小羣警察於全城（警察派出所），警察派出所又分佈一二警察至各地守衛，以如此分散的力量，據暴動經驗看來，實使暴動者有可能易於解除守衛警察的警察派出所的武裝，甚至無武裝的戰鬥員都可以解除他們的武裝。

可是警察方面嚴重抵抗的，總是警察隊（警察的後備隊）集中在警察總局的；例如漢堡一九二三年二十所警察局，其中十七所均在開始暴動時即被佔領。

一位參加漢堡暴動的指揮者曾說明佔領警察局勝利情形如下：解除警察局武裝的勝利，應描寫當地環境，每座（戰鬥員）有了一定的對象，繼續研究數日，那條路較近於那對象，並且熟悉警察局房間的佈置及其內部秩序。

所佔的警察局，每所約得馬槍及機關銃槍三十支。

在連維爾地方被襲擊的警察局毫未發生困難，即被佔領。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警察在暴動初期差不多全被解除武裝，一時暴動者所獲快槍計一千五百支。

然而爲要保證肅清警察起見，那必須要有審慎的準備。要解除一個家衛者武裝，須要戰鬥員三四人一隊先趁機研究守衛者行動的條件，解除武裝的時候，最好是在換班的當兒，因爲那時警察局留人較少。易於佔領。警備隊總是嚴厲的抵抗，因此，對後備隊住所進攻時要十二分注意與準備。至於攻擊警備隊住所，最好是用手榴彈及暴力大的炸彈。如果攻擊時因某種原因一下不易得手，那末，要設法制止警備隊的軍力，不作牠開動出來向暴動者進攻。

### 丙，政府軍隊

國家軍隊的行進對於暴動要算最危險的東西了。『自然，如果革命還未成爲羣衆的現象及獲得軍隊的時候，那末自然還談不到嚴重的鬥爭』（列寧）。軍隊既有這樣的力量，所以要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使軍隊在政治上發生動搖，應

當瓦解統治階級的這種工具。但是絕不僅僅在軍隊中立。在暴動過程中，軍隊總是站在或彼或此的某種方面，除去暴動經驗完全證明這件事實；即按其本性來說，牠亦無守中立的餘地。所以暴動的無產階級的主要任務，便是吸引牠到自己這方面來，因此在政府軍隊中做破壞工作是最重大任務。但是要軍隊動搖分化，並且投誠我方，還必須在軍隊中有少數（相當的數量）堅強而有信心的組織，牠們在緊急之時（暴動之時）能够反抗軍官幹部而使兵士羣衆贊助他們。

暴動的指導機關應盡全力使已瓦解的軍隊投降到暴動方面來，爲達到此目的起見，應該：（一）在暴動時派強有力的有信心的煽動員到軍營中去；（二）派男女工人孩童和軍士『親近』；（三）不讓反動軍官成分存在於兵營以內（消滅牠的顯著的代表者等等）；（四）斷絕指揮部與士兵的聯系（如電話等）。

未曾瓦解的軍隊，必然要反封暴動者，因此，必以武裝力量把牠肅清，可是這件工作對於暴動的無產階級是最困難的責任。因爲所有失敗的暴動正都是被軍隊

所剿滅（如一九〇五年莫斯科，德國，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廣東）。

反之，勝利的暴動的特點就是因為有軍隊（雖然是部分的）轉變到暴動方面來（例如一九一七年十月莫斯科，彼得堡的暴動的開始等等）。

至若在暴動之時用何種方法去肅清政府的可靠軍隊。則便看具體環境如何而定。如果在某城或某區，要有很好機會可即刻佔領軍械庫及武裝工人羣衆，那末在工人隊伍武裝以後，即可進行肅清軍隊的工作。同時在集中初期，對於政府可靠的軍隊應以武裝封鎖及破壞交通等方法，使其孤立。

如果一部分軍隊已轉變到暴動方面，並且工人隊伍已分配了武器，那末在暴動的初期即應襲擊政府可靠的軍隊，以達到解其武裝之目的。

一九二四年涅鮮爾的五十個武裝隊伍於十一月一號早晨五點十五分忽然進攻軍官學校，該地有三千個軍官學生，竟被武裝隊衝入軍校某一層房舍（軍校學生尚未起床），將槍架連槍佔領。到了襲擊第二樓的時候，因組織不好（有輕敵的驕氣

），二層樓的軍官學生遂努力反抗，結果暴動者不得不退却。

廣州，轉變到暴動工人方面來的學兵團，次夜三點半鐘舉行忽然的襲擊，解除了政府軍隊的很多計裝（步兵一團，一營，及炮兵一團）。

如果因某種原因不能肅清政府可靠軍隊，並且他你<sub>白</sub>與暴動者實行巷戰，那末此時應與牠作武裝爭鬥外，還要組織徒手工人羣衆（男女工人及小孩）與其親近解釋，使其瓦解而轉變到暴動者方面來；並且盡可能的在各地清除小隊伍的武裝（如巡警及守衛）。（按：組織徒手工人羣衆使與敵人親近，向他宣傳，使敵人心理動搖，減少他的反抗情緒，常能使他投降我們，在廣州暴動中這種工作未注意到，除向被包圍的敵人猛攻外便無方法了）。

#### 丁，資產階級政權的指導機關

暴動開始時，指揮壓迫工具（軍隊，警察等）的指導機關與指導人員（加資產階級的軍事家，政治家）有極重大的作用。因此，指導暴動者應設法制止此等機

關的活動。欲達此目的，應相時而動，將軍警要人的住所包圍起來，或者斷送他們的性命，或者使之與其部下及外界隔絕關係（在廣州暴動計劃中並未注意到這種工作）。在暴動一開始，必須設法佔領衛戍隊與警察局的總機關，或者斷絕其與外界之聯繫，目的在使其不能發號施令以指揮軍警的行動。但是此等機關有相當的防守，並有可能調動鄰近的援兵，所以要佔領牠們必須要有較大的武力。佔領此等機關的困難，在廣州及追維爾暴動時候可以充分看出。（在追維爾因敵人堅持抵抗，未能佔領軍政部；在廣州，為佔警察所尚發生劇戰，赤衛軍的猛攻始終未能佔領，後因學兵團一營趕到援助才達到目的）。

#### 戊，地方行政與交通機關

差不多在一切暴動中，我們均看出暴動者在暴動一開始便企圖佔領地方行政機關，車站，郵局，電報局等等，但佔領他們，必須要有必要的力量，而暴動者在開始暴動時力量多半不敷分配；故常發現分散的弊病，其實，有些機關如火車站，郵

局，地方自治局，及銀行等——在暴動初期還不必要佔領的。而必要佔領的祇是中央電報局與電話局，使敵人斷絕聯繫。奪取火車站的代替方法，可破壞電話線，使火車站與其他車站及機關斷絕聯繫。

由此鑑定暴動計劃時，必須在暴動初期，拒絕奪取次要的機關。所有的力量應注意於攻取這些對象，這些對象的佔領於消滅，直接決定暴動向前發展的命運。

## 六 暴動開始的注意

### 甲，選擇主要的攻擊點

在預定暴動計劃及進行暴動時，領導者必須自己明白，在此時候，在此具體環境之下，武裝暴動的力量前面的主要任務是什麼？自己所有的力量和工具必須依此估計而有相當的集中，首先解決主要的任務，然後依次解決次要的任務。今舉過去數次暴動為例來說明這個意思。

一九二四年萍雜爾的暴動中，領導者以爲主要的任務是去消滅政府方面可靠的軍隊，而尤其要首先消滅的，便是軍官學校。但是當去攻打這學校的時候，從二百三十個暴動者中僅僅派去了五十個人。明知自己的力量這樣有限，領導者却同時派了幾十個人去搶兩個火車站，政府的辦事廳，飛機站。軍官學校裏面藏有軍火，其他各地在暴動最初期間內比較兇都是次要，如果當時派了一半人去打軍官學校就要好得多了。

廣州暴動的領導者對於工人的武裝曾非常注意。可是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全部時間內，竟沒有去佔據有武裝的兵工廠。司令部沒有分配充足的力量去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要把暴動的力量使用的適當，領導者必須對暴動的環境有正確的估計，必須自己有一個明白的計較，知道那裏是戰鬥行動的重心，就把主要的力量往那裏進攻。

在準備暴動的時候亦必須分配力量去作準備工夫，以便在暴動開始時能解決主要的任務。比如領導者已決定暴動開始時應當去襲取兵工廠，那就在準備的時候，軍事組織及黨必須：（一）加緊兵工廠工人中的政治工作；（二）在兵工廠的衛兵中更<sup>加</sup>加緊工作；（三）在兵工廠附近的工廠中加緊組織工作，創立戰鬥隊；（四）自己所有的武器必須首先武裝去佔領兵工廠的戰鬥隊，

（在廣州暴動中，有一最可笑的大錯誤，計劃暴動的人應負很大的責任；就是在廣州西邊約二十里的增步軍械局內有四千支槍及數千手榴彈，並且守備兵的連長是韓國同志，但我們到十二日早才和他連絡，但時間已經不<sup>允</sup>許我們了。不能使這大部軍隊爲守備兵爲暴動來使用。這是何等的錯誤啊！）

### 乙，突然進攻

有時政府的力量和暴動開始時的暴動者的力量相差太遠，後者就不得不採取突然進攻的政策，使政府卒不及防即奪取其武器，解散其勢力之一部分。突然進攻

於清早時爲最宜，因爲那時兵隊和警備隊尙在睡眠，而同時正好趁工人早上進廠的時候，吸引他們去參加巷戰。

黎明前突然進攻的策略，在許多暴動中都會採用過的。

一九二三年漢堡少數戰士在早上五點鐘突然進攻，解除了十七個警察派出所的武裝。但因有種種原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命令全國取消暴動計劃亦原因中之一），所以不但工人未加入巷戰，且大部分的軍事組織亦未加入。這一次暴動者僅一百五十至二百人與十倍之多的敵人足足支持了三晝夜。

一九二四年涅維爾暴動者共二二〇八於早上五點十五分時進行突然的襲擊，（一）約二〇至二五人一小隊，衝入一個軍官學校的下層房屋內，將尙在睡眠的軍官學生驚得呆了。奪取了他們的槍枝；（二）十三人的一小隊奪得飛機場，那裏屋內有人三十至四十，機關槍六架，當向飛機場進攻時，此小隊中途解除了一個警察派出所的武器；（三）一個十二人的小隊解除了政府辦事房內衛隊（十一人）的武裝

，並佔據了該房屋：（四）一個十二人的小隊解除一個警察派出所的武裝，奪取了車站，在站中又解除了幾個軍官的武裝。

但是因爲武裝暴動者人數太少，故突然的進攻不曾把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軍官及下級軍官學校，鐵甲車隊，警備隊，參謀部）的武裝解除。因此數小時後暴動即被撲滅。

追維爾的暴動不但對於愛沙尼亞的資產階級是突如其來的，並且對於涅維爾量很少的無產階級也覺是突如其來的。共產黨及其軍事組織在工人中間幾乎一點準備工作都沒有做，一點也沒有喚起他們來參加巷戰以對付政府的軍隊。那時愛沙尼亞正是白色恐怖橫行，共產黨在極端的秘密中工作，因此不能進行廣大的羣衆工作，以準備武裝暴動。工人羣衆的廣大的準備思想上與組織上因秘密與突擊的緣故而被犧牲了，終之使暴動的成功大受損害。

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僅在幾個不很大的城市（諾瓦維薩哥拉，弗南金南督府）

中曾對政府的力量舉行過突然的進攻，這些進攻都得了勝利。大多數的突然進攻，都是事先未曾被人發覺。農民暴動隊在不利的條件下，零星的公然的與軍隊及憲兵作武裝戰爭，因之總是不能奪取城市。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廣州的暴動是採用突然進攻的方法，開始首先攻擊政府方面可靠的軍隊和警察的；進攻的結果十分良好。在軍事組織暴動了以後，廣州的無產階級羣衆~~也~~加入了武裝爭鬥。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上海的突然進攻警察，一天即成功了，大獲全勝。

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十月暴動，并不曾含有突然進攻的性質，那時不用這個策略，因為絕對大多數的軍隊都站在暴動的方面，而且還有強有力的紅色先鋒隊。

從上面所舉的例，可知軍事組織的同時突然進攻的方法，在軍事上講來是十分有利的方略，可是，必須採取一切手段以作標準，使在軍事組織上在技術上開始了

的暴動，能得工人羣衆的及時的擁護，且擴大之。

漢傑，遼維爾及最初兩次上海暴動的經驗，告訴我們說，將軍事組織所突然開始的武裝爭鬥與羣衆的行動連結起來，是件很不容易的一樁事，要在暴動時吸引工人羣衆使之及時的參加巷戰，必須：

- (一) 工人羣衆有異常的革命活動（革命勝利的的基本條件之一）；
- (二) 共產黨在工人羣衆中有威權；
- (三) 及時的對工人羣衆預先有走向武裝暴動的政治標準；
- (四) 進行總罷工及其他各齒革命形式的革命羣衆運動；
- (五) 採取各種組織上的手段以吸引羣衆加入巷戰（將暴動時須指派負責的煽動者在工廠中進行罷工，引導羣衆奪取武裝，煽動對政府軍隊兵士的『親近』，與警察爭鬥等等）。

如果軍事組織的武裝爭鬥不與工人羣衆的進攻相密切結合，暴動的成功是不可

能的。

### 丙·同同時爆發

暴動中的同時爆發，有絕大的意義，因為在同一時間之內將全部暴動的力量一齊迸發，阻止了敵人自由行動的機會，不讓他集中力量來各個擊破暴動者的勢力。

因此，凡在組織暴動時，務必企圖將所有的一切力量同時開始暴動。在一個城市中實現這種同時爆發的鬥爭比較的尙稱容易，然而據多次暴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暴動的組織者並常常能完成這種同時爆發的任務的。

比如在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暴動時，爲奪取縣城斯塔拉雅薩哥拉曾派出四個農民隊，人數共有一〇〇〇，這一千人必須突然佔據該縣城的一切出路以便同時四面八方的進攻（該城中政府軍軍的力量約有一千五百人，和三十架機關槍，十二尊大炮）。當這一方面發出信號開始進攻時，城中工人手榴彈隊就必須立刻去劫獄。

時候到了，劫獄的人是動手了，但是農民隊却完全沒有準備好，因之同時爆發的

計劃不會成功。政府軍隊得此機會即分段的將暴動者打敗了。

又如在同一的保加尼亞，在一九二三年爲要乘夜劫取卡散勒克縣城，曾派該縣武裝農民隊約共一千人去進攻。城中政府軍隊約有六百人，有二十架機關槍。預定以『全城電燈熄滅』爲信號，但電燈沒有熄滅，於是暴動者開始零星的發動起來。

在第一次上海暴動（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號）軍事進攻的時刻約定在晚上二點鐘，到三點鐘爲止，全體暴動的戰鬥力量必須準備好，但開始行動須另聽特別的信號。該特別信號乃是由投降到暴動方面來的炮艦的放炮，而放炮的信號必須看國民政府的代表鈕永健的私宅所放起的火箭爲號。鈕永健在他的住宅內放火箭，炮兵沒有看見，炮沒有放，暴動因此也沒有開始；僅僅有單獨的暴動隊與警察發生一些小衝突而已。

第二次的上海暴動，約定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三點鐘。暴動的信號

乃炮艦向兵工廠放炮。不曉得爲什麼緣故，炮又沒有放。於是暴動者等候了幾  
個鐘頭，看看沒有事，就各自回家去了。此後暴動開始改在二月二十二日十八小  
時，亦聽炮聲爲號。這一次，炮手準時向兵工廠和在營內開了炮了。暴動在南  
市開始，但閘北的暴動者沒有聽見炮聲，因此亦就沒有參加暴動（閘北與南市中間  
尚隔開幾個外國租界）。此外，許多暴動者在事前都準備在約定時刻出發的，可  
是這一次都沒有到集合地點去。

第三次上海暴動約定在二月二十二日內十三點鐘（早先一小時，即在十二小時  
，開始罷工），再沒有其他任何『信號』。果然暴動準時開始了，而且成功了。  
上而所舉的列子告訴我們說，暴動的組織者甚至在一個城市內舉行暴動時，在  
技術上也往往不會實現同時的爆發。並且預定的暴動沒有開始，是因爲預定的信  
號火箭沒有放得好。依靠任何的信號來開始暴動是不對的，信號往往可以達到許  
多意外而不可靠（在敵人的監視之下難以動手，火箭沒有看見等等）。如果在（

個城市內起暴動，總不要用什麼信號，只須指定時間，按時即起軍事行動。農民隊攻城時亦可按一定時刻開始，不過在開始之先，必須先巡察一番，看近郊的農民隊伍是否都已集中到了各預定的出發點。

如果以全國的範圍（在西歐）和全省或數日（在中國）的範圍內實現同時進攻的暴動就更難了。但暴動必須企圖同時爆發。凡政府機關愈是集中，交通和連繫愈是發展的地方，同時暴動即愈重要。暴動者行動彼此參差有如何惡劣的結果，我們一看保加利亞暴動的列子就知道了。

在九月十三日有兩縣已經動手了；九月十四日又在另外之縣的某幾區域中開始暴動，九月十六至十七日斯塔拉薩哥拉一帶全被暴動波及了；九月十八至二十日暴動擴大到全保加利亞大多數縣份中。但是共產黨所指定的全國暴動時間却在九月二十二日，因為不會在全保加利亞各處同一時候開始暴動，故政府軍隊得以集中起來分段的打敗暴動者，在一地勝利之後又調遣到別一區域內去。如果那次暴動

是依照了預先詳細規定的計劃，同時在全國暴動的（這在當時是可以做到的），那麼像一九二三年九月全保加利亞那種真正羣衆的人民的暴動，就不一定爲保加利亞的政府這樣容易壓倒了。以後領導暴動的人在這一點上，一定要記取保加利亞暴動的教訓

#### 丁，爭鬥中之積極性與堅忍性

暴動者在武裝爭鬥中必須表現出最大的積極性來。有利的機會，一個也不可錯過，必須利用之以打敗自己的敵人。如果該組或隊的暴動者已完成了他所擔負的工作了，那末他們決不可就此苟安下來，必須去搜捕敵人至敵人完全消滅了而後止。

經驗告訴我們，暴動者在這一點上常犯很大的錯誤。例如一九二一年德國暴動時，德國中部的『林那威爾克』工廠區域內，數萬工人把該區域的政權拿到他們自己手上去了，組織了很大的工人武裝隊。其時附近僅數十里之遙有些城市中，

政府的力量是很單薄的，如果工人軍那時去搶這些城市一定很容易得手，大可由此擴大暴動的區域，增加自己的力量。但是他們沒有做，他們坐起來再不動作了。於是政府的力量及當地的資產階級就得組織起來，此後暴動者就被打敗。

一九二四年遼維爾的暴動者奪得了飛機場，又是三十至四十個飛機場的工人去和他們聯合。在飛機場中搶得了六架機關槍，且有運輸的人。暴動者於此大可向城市進攻，去幫助他們的同志們。但是暴動者却苟安起來了，逗留在飛機場內不動，於是政府的軍隊在打敗了城中的暴動之後，在十二句鐘時又來奪回飛機場。

巷戰時暴動者的忍耐性其意義之重大亦不亞於此。尤其是在暴動暫時失利的時候，堅忍的意義就更重大了。

就大多數的情形講，暴動一開始就消滅了敵人的抵抗能力這種事是極少見的。

暴動者必須準備持久的鬥爭，以便延長時間，使暴動來得及吸引工人羣衆來參加武裝鬥爭。要達到這個目的，非暴動的武裝隊伍方面有堅忍性不可。

這種堅忍鬥爭的好榜樣就是一九二三年漢堡的一百五十至兩百個戰士與十倍之衆的敵人堅持三晝夜，又如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的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的暴動等等。

非常不好的榜樣就是如一九二四年迨維爾的暴動。暴動者一點也沒有堅持，一經接觸，受到第一次的失利簡直沒有對政府的軍隊抵抗，於是暴動在三四小時內就被撲滅。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工人羣衆乃怕是全全準備着鬥爭的，體力上也來不及加入巷戰，與戰鬥的組織協同行動。

戊，暴動的領導。

暴動的領導不是由軍事組織去做，而是由該城，該區等共產黨中負責的委員會去做的。爲工作進攻有結果起見，往往由黨委員會中成立一個革命委員會。暴動起來以後，須看情形，酌量加入羣衆革命組織的代表於革命委員會中。至於軍事組織及其領導者僅爲技術機關，爲軍事參謀部，其責任在技術上領導暴動。

## 六 在農業國中暴動的特點

### 一 武裝農民的進攻之作用

上面所說的組織及進行武裝暴動的各種原則，對於農業國及農業區還是有用的，但其應用的條件却大不相同了。

在農業國及農業區域中，城市一般的居民是很稀少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數目也不十分大，政府的權力及其行政機關，以及武裝勢力（軍隊，警察等）多半是集中於城市。因此單靠城中的居民很少的無產階級就不易得到暴動勝利和獲取政權。

在這種條件之下，奪取政權的爭鬥能否勝利，就依靠農民羣衆的進攻，依靠武裝農民隊伍與城市無產階級的協同行動。

工人與農民羣衆及其武裝隊伍之協同行動，對於革命及暴動有如何決定命運的意義，我們一看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暴動，及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一九二四年愛沙

尼亞的暴動就知道了。

一九一七○彼得格勒與莫斯科武裝暴動的成功與十月革命的勝利。由於大戰時徵募農民而成的軍隊擁護了暴動的無產階級而決定的。

在保加利亞暴動的主要力量乃人數衆多的武裝農民隊伍，他們攻城以求推倒資產階級的政權。說到這裏，應當指出來，就是在一九二三<sup>年</sup>○九月時，保加利亞分散於各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不會表現出必須的活動與決心來。在保加利亞，一見就知道困難是在實現武裝農民隊伍的聯合行動？因此農業國中——尤其是中國——的共產黨、必須特別注意於農民武裝隊伍的組織，準備與協同行動。

在愛沙尼亞共產黨沒有能夠喚起廣大的農民運動來，沒有能夠組織起武裝的農民隊伍來。因此城市無產階級——而且<sup>也</sup>只有涅維爾的無產階級——孤軍獨戰。

愛沙尼亞的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少數的無產階級不得其幫助而單獨起來奪取政權，這在實質上已是不需完成的任務了。涅維爾的無產階級，人數共只一萬

二三千光景，其前鋒的活動的戰士（共產黨及軍事組織）之數更少，大膽的起來暴動，實在沒有任何勝利的把握可說。

從上述的例，可見無產階級暴動中農民羣衆的擁護是有了怎樣大的作用。於此亦不難見，將來暴動時，牠還有怎樣大的作用了。工業無產階級的武裝進攻與農民羣衆的聯合，對於中國一定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中國的農業革命還在等待着根本的解決。

## 二 武裝暴動時農民隊伍的行動

欲求暴動之成功及保持已奪得的政權，決不可只限於一個或數個城市之內。

暴動必須依全國範圍組織起來（如果在歐洲各國），在中國則必須以一省或屬於各派的軍閥勢力下的數省爲範圍。同時在農業國中（尤其是在中國）農民的武裝隊伍尤有特殊意義。

其行動的特殊性質如下：

- (一) 紀律性很薄弱，故其行動難於彼此照顧；
  - (二) 不肯輕離故土，難以調到遠方去做軍事行動；
  - (三) 當進行城市的戰鬥時，農民軍不慣城市鬥爭的條件；
  - (四) 耐苦，善於跋涉；
- 暴動時農民隊伍的任務：
- (一) 消滅當時舊政權的代表者；
  - (二) 迅速創造武裝農民隊伍，不論什麼兵器都要利用；
  - (三) 約期進攻城市以期佔據之（與城市革命勢力協同行動：消滅政府的力量，更進而加增武裝隊伍的力量，創立蘇維埃政權等等）；
  - (四) 倘若常備軍有在城外活動者，則用遊擊戰爭以反對之。
- 共產黨及其軍事組織在革命發展時，必須在當地及時組織及準備中堅份子，一

到武裝爭鬪的時候，這些中堅份子即成爲組織農民武裝隊的骨幹。在中國必須採取一切連帶的手段，以利用現有的各種半迷信的農民隊伍，吸收他們到一般的革命爭鬥中去。

每省或區的暴動領導者必須顧到農民隊伍的一切特點，適宜的應用之於暴動的過程中，而同時尤須特別注意各農民隊伍相互之間，及其與城市中工人的進攻之間彼此呼應的活動。

當計劃一省或一區的暴動計劃時，凡上面講城市中武裝暴動的計劃時說過的那些根本原則，却必須遵守，同時不要忽略農民隊伍行動的特點。

附 附

## 馬克斯主義與暴動

列甯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

中央委員會書——

（書於民治會議時期）

『社會主義』黨派曲解馬克斯主義的最可惡的，而且最流行的方式之一，便是一種機會主義者的謊語，說準備暴動，是『勃蘭基主義』（Blanquism）。

機會主義派的首領倍恩思坦（Bernstein）以誣蔑馬克斯主義為『勃蘭基主義』

「而獲得了可恥的大名；現在高呼『勃蘭基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也沒有一人能替倍恩思垣的枯燥的觀念，添上多少新的內容。」

他們因為馬克斯主義者把暴動當做藝術看待，所以誣蔑他們是勃蘭基主義者！天下有比這個更可恥的抹煞真理的事麼？馬克斯說暴動是『藝術』，他早已自己非常精確而肯定地解釋過了；他說我們必須將暴動看作像藝術一樣。我們必須獲得第一次勝利，以後，利用敵人的秩序紊亂從一個勝利，轉入別一個勝利，一刻不停地向敵人進攻。……

如果要使暴動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以靠着一種秘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暴動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這是第二點。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頂的轉變時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底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宿疑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的動搖的那個時候，

暴動才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這三個條件，馬克斯主義對於暴動問題的立場，和勃蘭基主義，大不相同。

但是如果當這些條件具備時，而還不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看，那末這便是背叛馬克斯主義，背叛革命。

爲什麼現在這個時刻，剛是許多客觀事實，逼迫我黨承認暴動是目下的切身的任務，而又把暴動看作一種藝術，爲要證明這點起見，我們最好是來應用一種比較的方法，把七月三四月那幾天情形來與九月末時候的情形比較一下。

對於七月三，四日的那幾天，我們很正當地可以這樣推論：在那時奪取政權，比較着是正確，因爲即使我們不奪取政權，我們的敵人，也要誣蔑我們造反謀亂。以對付叛徒的方法，對付我們。但是那時我們不能夠從這個推論當中，得出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須知暴動勝利底客觀條件，那時還沒有具備。

(一) 當時在我們這方面，還沒有可作革命先鋒隊的那個節級。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裏還沒有獲得多數。而現在我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內部，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了。這個多數，只是七八兩月的事件，『鎮壓』布爾塞維克事件和康尼洛夫（Kornilov）的叛變底經驗所造成的。

（二）當時還沒有全體民衆的革命高潮，而現在康尼洛夫事變之後，這是已經有的了。各省所發生的事件，和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之奪取政權，都把這事證實了。

（三）在那時候，我們的敵人隊伍中間和不堅定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那種普遍的政治的『動搖』。現在那種動搖，已經達到極點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協約國的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協約國是世界帝國主義之主腦）——現在正搖擺於求得最後勝利的戰爭與反對俄國的局部和平二者之間。我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呢，他們已經很明顯地丟去了多數的民衆，牠們已經在那裏極厲害地動搖了。我

們拒絕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

（四）因此，如果在七月三、四兩日，發生暴動，那便是一個錯誤，因為那時，我們在體力上政治上都是不能保持我們的政權的。在體力上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那時彼得格勒雖然暫時落在我們的掌握中，可是，我們的工人和兵士，不會因奪取彼得格勒而甘心情願的奮鬥，而犧牲生命：當時他們還沒像現在這樣的憤激，他們當時對於克倫斯基以及采萊台理邱爾諾夫等的怨恨憤怒，還沒像現在這樣的沸騰，當時在克倫斯基政府（藉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之助）殘酷壓迫布爾維克的情形之下，我們還沒有飽經鍛鍊的工作人材。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日那個時候，也不能夠保持政權，因為在康尼洛夫的叛變之前，政府的軍隊和各省的力量，能夠而且已經開始向彼得格勒進攻。

現在的情勢，就完全不同了。

在我們這方面，已經有了革命先鋒隊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羣衆。已

經有了能够領導羣衆的先鋒隊的大多數羣衆。

現在我們這方面已經有了大多數民衆；因爲邱爾落夫的離職，是許多憑證中最顯明的最清楚的一個，牠證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同盟的那方面，不能得到土地（即使從社會革命黨本身方面，農民也是得不到土地的），可是革命的全民性質的要點，就在這上面。

現在我們的黨，處於優越的地位，在全部帝國主義和整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同盟極端動搖的狀況之下，我們底黨，能够堅決地知道自己的道路。

我們穩當地可得到勝利，因爲民衆差不多近於絕望的地步，我們給全體民衆指出『康尼落夫事變時』我們領導的意義。這次事變以後，我們向聯盟派，提議妥協，可是他們終於繼續不斷的躊躇動搖，而拒絕我們的提議。到了現在，唯有我們，給全體民衆指出正確的道路。

我們如果現在還以爲我們的妥協的提議，『尙未』被拒，以爲『民治會議』還

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麼這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個提議，是由一個政黨向其政黨提出的，不是這樣，便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提出這個提議。但是其他這些政黨，已經拒絕了這個提議。所謂民治會議，僅僅是一個會議而已，實際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民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的代表，並沒有憤激的最窮苦的農民的代表，牠是一個少數人民的會議。我們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以對付國會的態度，來對付這個民治會議，那末。我們便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便陷於極無希望的國會的狂疾的之中了；因爲民治會議，即使宣佈自己爲國會，即使宣佈自己爲革命的最高國會，牠也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最高的決議權，不是靠着民治會議，而是靠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域。

所有暴動勝利的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我們可以有許多地位上的優勢，只要我們在暴動中獲得勝利，消滅那種摧殘民衆的動搖，消滅這個世界上最壞的東

西（指勃格），只要我們在暴動中，獲得勝利；破壞不利於革命的局部和平的鬼計，而公開建議更完美更公正的而且有利於我們的和平。

最後，唯有我們的黨，獲得勝利以後。才能救出彼得格勒。因為如果我們和平的提議，被敵人所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都不能得到，那麼我們就會變成『保衛派』，我們就會領導主戰的黨派，那時我們就會變成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將採取真正革命的方法，來進行這個戰爭。我們將要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鞋子。我們只給他們（資本家）以小塊的麵包，我們只給他們以木屐草履，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鞋履，都拿去送到前綫上去。

我們在那時能夠固守彼得格勒

我們在現時還依然擁有極豐富的，可以供給真正革命戰爭用的物質上和文化上的財源；我們有九成的把握，相信德國至少會同意與我們停戰。須知在目下，能夠達到停戰這一個地步，就無異於戰勝了『全世界』。

我們爲挽救革命起見，我們深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暴動，是絕對的必要，所以我們現住：第一，必須在民治會議上使我們底策略，適應於正在起來的暴動底條件。第二，我們必須證明，我們之接受馬克斯的『必須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的教訓，並不是僅僅在口頭上。

在民治會議中，我們必需立即鞏固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黨團，我們不要計較數量，我們亦不要怕動搖的份子，跑到搖動份子的營壘中去；他們處住『那邊』，比較處在這邊堅決的熱烈的戰士的營壘中，更有利於革命。

我們必須一篇简短的布爾塞維克的宣言，在這篇宣言當中，我們要非常尖刻地指出冗長的演講，以及一般『演講』之不合時機，說明挽救革命的直接行動之必要，與資產階級完全脫離關係之絕對的必要，說明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局部』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最後並須指出整個政權應該立刻轉入革命無產階級所引導的革命民主派手中。（九月二十二日梁

尙諾夫 (Shanin) 曾經代表布爾塞維克派根據這個意思，在民治會議中，發表了一次宣言。

在這個宣言當中，我們必定要簡單，而且強有力地做出這個結論，以和我們政綱草案相呼應：給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以卑鄙齷齪手段得來的利潤，制止資本家任意破壞生產。

這個宣言，能夠愈簡單愈銳利就愈妙。在這宣言中，還須指出下面的兩點：民衆因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底動搖和躊躇，已經受盡了痛苦，而且達到了絕望的地步，我們必需堅決的果斷的，和這兩個政黨破裂，因為他們背叛了革命。

我們在宣言中所必須提及的第二點：我們要立刻提議沒有併吞的和平，要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實行斷絕關係，我們這樣立刻可以達到停戰，或是可以使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轉過來保衛自己，並且在全體革命的民主派，在革命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進行真正公平而革命的戰爭。

我們發表這個宣言後，我們就要求不講廢話，不作空洞的決議案，而決定實際行動，以後我們就應該動員我們整個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向各工廠，各兵營中去活動，那些地方，正是挽救革命的源泉，也是民治會議的推動者。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在許多熱烈奮激演講中，說明我們的政綱，並且提出這樣的問題；或是完全接收這個政綱，或實行暴動。折中的路，是沒有。等待是不許可的。革命現在正在危急中呢。

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把我們的組織集中到工廠和兵營中去』，以後，我們就能夠很正確地估定暴動爆發的時期。他們如果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來進行暴動，換言之就是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末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不失分秒地組織暴動隊伍的總參謀部，分配我們的力量，把我們可靠的軍隊，集中到各個最重要的地點上去，包圍亞力山大戲院（Alexandrikska）佔領彼得派安洛夫炮台（Petropavlovka）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派我們的敢死隊去進攻士官

隊 (Junker) 和『野蠻的騎兵師』(這是康尼洛夫的哥薩克騎兵軍中之一師)，不讓敵人衝到城市中心來，我們必須動員武裝的工人，號召他們作拚命的最後的決戰。同時就須立刻佔領中央軍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暴動者的參謀總部，設置在中央電話局裏，使之可和所有的工廠，所有的軍營，以及所有的暴動鬪爭的他點等等，都用電話連絡起來。

自然這些都不過舉其大概而已；這些不過說明在現在這個時期當中，如果不把暴動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麼就是不忠於馬克思主義，就不是忠於革命！

作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十四日。

## 局外人的建議

列甯

我寫這幾行文字時，是在十月八號，要九號到彼得格勒同志的手中，恐怕是很難的，北方蘇維埃大會，在十月十號是要開的，所以我的文字，儘有遲到的可能。但是無論怎樣，我希望，在彼得格勒及別處工人兵士將要動作尙未動作的時候，把我局外人的建議提出。

全部政權，應轉給蘇維埃，這已是毫無問題，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權（或是布爾塞維克的政權——因為現在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能夠得到全世界被剝削的勞苦羣衆之極大的同情與堅決的幫助（特別是在交戰國中，尤其在俄國農民中），這點在每個布爾塞維克看來，都是絲毫沒有疑慮的。關於這些，大家都知道，這是久已證明過的真理，不值得多說。

我所要說的，是同志們還不全完明瞭的問題：即，現在要使政權轉入蘇維埃手

中，就是要在實際上實行武裝暴動，這好像是很明顯的，但是好些同志對於這點沒有用心想過，而且現在還不用心去想。現在如果忘掉武裝暴動，那末等於忘掉布爾塞維克主義最主要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等於忘掉整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但是武裝暴動是政治爭鬥的一種特殊形式，受一定特殊的規律所支配，我們對於這些規律，應該可以深思熟慮。關於這個道理，馬克斯說得非常透澈明白。他說：『武裝暴動和戰爭一樣，是種藝術』。

此種藝術的主要法則，馬克斯提出以下幾項：

（一）無論何時，不要以暴動爲兒戲，應該堅決的知道，一旦暴動開始，就要做到盡頭（一不做，二不休）。

（二）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一定要多集精銳於要點，不然，組織好訓練較良的敵軍，便會把暴動者消滅。

(三)「一旦暴動開始，就要採取最堅決的行動，要馬上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守勢是武裝暴動的死亡』。」

(四)應乘敵人之不備而襲擊之，在敵軍尚未集中之時，乘機猛進。

(五)軍事上每天應有進展，(在城中則每點鐘應有進展)雖小不妨，無論如何，一定要鼓勵士氣。

馬克斯用歷史上革命戰略的巨家但願的話，來總結一切革命武裝的教訓：這便是『勇敢，勇敢，還要勇敢』。

如果把牠應用到俄國，應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候，那麼就是：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來進攻彼得格勒，一定要內外同時夾攻，工人從工人區域中打出來，外面要從芬蘭，從利弗爾，從克倫士達特打進去；再加上全體艦隊之進攻，並集中大批精銳，來撲滅一萬五千到二萬(或多些)的『資產階級自衛軍』(士官生)及我們的『凡台軍』(註)哥薩克之一部)等等。

(註)凡台軍是法國革命時反革命的軍隊。

要善於運用我們三部主力：艦隊，工人，及軍隊。不管犧牲幾多，一定要先佔據電語局，電報局，火車站與橋梁。

挑選最堅決的分子（我們的敢死隊的青年工人，以及海軍兵士）組織小的隊伍，去佔據最扼要的地點，參加各處緊要的軍事行動，例如：

要使艦隊，工人及軍隊聯合攻打彼得格勒，加以圍困，並截斷外援，以奪取城市——這個任務，需要靈術及三倍的勇敢。

要把最好的工人，組成小隊，帶着槍枝及炸彈，去圍攻敵人之『中心地』。

（如士官學校，電報局，電話局及其他）。

我們的口號是：我們寧可死完，但不能放走敵人。如果決定暴動，那麼我們希望暴動的指導者，能把但頓，馬克斯兩大偉人的指示，好好的應用。俄國及全世界革命成功與失敗，就要決於這兩三天的爭鬥中。（此文作於1917, 10, 8.）

# 致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中央 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及莫斯科委 員會書

列甫

親愛的同志們：

事實已經這樣明顯地把我們的任務告訴我們，使我們的延遲等待，等於『罪惡』。

農民暴動正在發展起來，政府加緊野蠻的壓迫。軍隊對於我們的同情，正在增加（莫斯科百分之九十九的兵士是贊成我們的；芬蘭的軍隊和海軍，也是反對政府的；而杜伯索夫的宣言，也表示軍隊不願繼續戰爭）。

在德意志一方面呢？特別是從屠殺水手以後，革命的發動，已經是很明顯了

。在莫斯科底選舉中，百分之四十四票數是屬於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勝利。要是和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人一起，那末，我們顯然是佔全國的大多數。

鐵路和郵政局的職員和工人們，也在那裏同政府起衝突了。對於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李比爾，坦』們（即孟雪維克們，李比爾，坦是兩個孟雪維克派人，李比爾，坦合稱，即是孟雪維克派）已經不說十二月二十的代表大會，而在說『二十日代表大會了（即是說沒有一定的月份）』。

在這些情形之下，如果再遲延等待，便是一種罪惡了。

布爾塞維克黨人是沒有權利可以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他們必須立即奪取政權。唯有這樣做去，他們才能够去挽救世界革命（因為不然，世界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德意志發生屠殺之後，就會聯合起來，一致向我們進攻）。唯有這樣做去，才能挽救俄國革命（因為不然真正的無政府狀態的高潮，會比我們還要強大）。

唯有這樣才能救得前線上數十萬人民的性命。

等待更是罪惡。等待蘇維埃大會只是幼稚的拘泥於虛禮的兒戲，也是空講禮節的兒戲。實際上這只是背叛革命的行為。

如果不經暴動，已不能奪取政權，那末，我們必須立刻開始暴動。但是如果此時莫斯科蘇維埃（同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致動作）立即獲取政權，宣佈自己為政府，那末很可能的，我們或可以不經暴動而取得政權。在莫斯科方面勝利是可以保證的，那邊不用對誰爭鬥。在彼得格勒方面，我們是能夠等待的。因為政府此時已無能為力，牠已經是無可挽救，牠總是投降的。

莫斯科蘇維埃奪取了政權，佔領了銀行，工廠和『俄國新聞』（一種報紙）之後，牠就得到極廣大的基礎和極強固的力量，牠就可以煽動全俄羅斯，而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拿破崙式的克倫斯基退讓了（但是如果不退讓，我們就要推翻他），那末我們就立刻在明天提議和平。我們就可以把土地交給農民，立刻可以對鐵路

工人和郵務職員讓步……等等。

一五八

我們並不是一定要在彼得格勒『開始發動』。要是莫斯科一點不流血地『暴動』起來，那麼第一，前綫上的軍隊一定會以同情來援助牠；第二，各地農民也一定會起來響應牠；第三，海軍及芬蘭的軍隊，將向彼得格勒進取。

即使克倫斯基在彼得格勒附近還有一二個騎兵可供指揮，但他也是不得不降服於我們的。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可以等待，牠可以為莫斯科的蘇維埃政府，做煽動工作。我們的口號是：政權歸蘇維埃；土地歸農民；給人民以和平；給餓殍以麵包。

勝利是有保障的，而且我們有十分之九的把握，可以滴血不流地獲得這個勝利。

果如遲延等待，那便是一種反革命的罪惡。

列甯致敬 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至二十之間

# 告同志書

（摘錄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告同志書中一節）

有人說：

『……我們沒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那末暴動是沒有希望的』。

能說這樣話的人，或是曲解真理，或是像學究先生那樣絲毫不顧革命的實際狀況，而無論如何總想預先得擔保，使布爾什維克黨剛剛在全國得到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在歷史上，無論在那個革命中，都不會有這樣的擔保，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擔保。提出這種要求，等於嘲笑聽衆，這正是想遮掩自己的實際情形『背道而馳』的行動。

實際情形明白地告訴我們，大多數人民正是在七月事變以後，方迅速地轉到布爾什維克一方面來。蘇尼洛夫叛變以後，八月二十日的彼得保的選舉，證明這點，在這次選舉中，布爾什維克數票的百分數，不算城外，只算城內就已從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三十三；莫斯科區議會的選舉，也證明這點，布爾什維克數票的百分比，從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四十九又三分之一（日前所遇到的一位莫斯科同志告訴我正確的統計是百分之五十一），蘇維埃的選舉證明這點。大多數農民蘇維埃掉首不顧『阿夫克生且也夫』的中央委員的意見，而起來反對合作政策。反對合作政策，就是實際上贊成布爾什維克。再次，前綫上的消息，更不絕地確定地指示出兵士羣衆，不管社會革命黨孟雪維克首領，軍官，代表等等，如何刻毒地謾罵攻擊，總是更加堅決的轉到布爾什維克一方面來。

最後，近來俄國內最大的事變，是農民暴動，這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指示出人民轉到布爾什維克一方面來。無論資產階級報紙怎樣造謠，無論他

的附和者『搖擺不定』的新生活派先生們，怎樣高呼蹂躪運動和無政府狀態，但是事實擺在目前，担包夫省的農民暴動，不僅是具有外表的暴動，而且還是含有政治意義的暴動，這暴動產生非常重大的政治效果，如第一，他們得到了土地轉交農民的允許。無怪爲暴動所嚇怕的社會革命黨的飯桶，直至『人民事業』報爲止，現在哀呼土地必須轉交農民！這就是實際上已經證實布爾什維克主義正確，及其勝利。所以我們看到除了暴動以外，再不能有別的方法，可以『教訓』拿破崙之徒及出席國會預備會中的走狗。

這是事實，事實是再爽直不過的東西。這種事實上的贊成暴動的理由，勝於驚惶失措，進退維谷的數千句『悲觀』論調。

如果農民暴動，不是會有全國政治意義的事變，那麼，國會預備會中的社會革命黨走狗，或許就不會高呼土地轉交農民的必要。

農民暴動的另一個極好的政治與革命的結果，如『工人之語』報所說的，是轉

運麵包到坦包夫省的火車站上來。請看，驚惶失措的先生們，這就是另外一個理由，贊成暴動的理由，指出暴動是挽救國家出於已在目前空前飢荒與經濟危機底唯一辦法。當叛賣人民的社會民主黨及孟雪維克，呻吟，恐嚇，起草決議案，空口允許以召集立憲會議的方法，來果餓殍之腹的時候，民衆已經起來按照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用反對地主，資本家，投機商等等的暴動，來解決麵包問題了。

就是資產階級的報紙，甚至『俄羅斯民黨』報，也不得不承認這樣解決問題的辦法（唯一的實際解決辦法）產生極好的效果，『俄羅斯民黨』報登載這樣消息，說：「在農民暴動起來以後，坦包夫省車站堆滿了麵包。」

現在如果還懷疑大多數人民是否贊成布爾什維克，那麼等於可恥地動搖不定，而在實際上拋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完全脫離布爾什維克主義。

# 暴動的規律

馬克思

暴動是一種藝術，與戰爭及其他的藝術一樣。他要受某種規律的裁制，若是忽略了這種規律，那麼，犯忽略之罪的政黨，必致毀滅。這些規律，是政黨的實質及目前所處環境的實質所產生的邏輯上之演繹，他們是這樣的明瞭和簡單，使一八四八年的短期經驗，儘够使德國人熟知他們。

第一，倘然沒有鬥爭到底的決心，那麼，無論何時不許以暴動爲兒戲（直爽點說：要顧到這種玩意兒所產生全部的結果）。暴動是非常不固定的容量的平衡。這種容量的價值，是每日可以變更的。暴動者所對抗的勢力，擁有種種組織上紀律上以及歷來威信上的優勢（馬克思是指暴動的最難之點：即是反對『堅固的舊政權』，反對還未因革命的影響和政府的動搖而渙散的軍隊）；倘然暴動者不能匯集巨大的力量，以反對他們的敵人，那麼，他們必遭失敗而滅亡。

第二，暴動一經開始，就要以最大的決心去幹，而採取攻勢。凡武裝暴動而取守勢，乃死亡之路；如果防守。那麼，在未和敵人較量勢力以前，已先敗亡。

當敵人的軍隊還是分散時，應乘其不備而襲擊之，應該企圖每日獲得勝利，不論如何之小都好；暴動羣衆在得到第一次勝利以後，應把所得的雄壯的士氣，保守起來；應該吸引那些搖動的分子到自己方面來，這些分子總是跟着強大的那方面跑的。

總是跟着可靠的那方面走的；在敵人未集合他們的軍隊以攻擊你們之先，你們就要迫之退却；總之，你們要按照自古以來革命策略上最大名家但頓 (Danton) 的話做去：勇敢，勇敢，還要勇敢。

(馬克思：『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第十七章)

一九三二年二月再版

馬克  
甯著

藝術論  
(全一册)

每册定價六角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